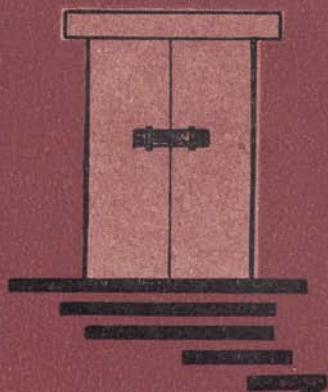




談文外門

鄭子瑜著

香港世界出版社印行



洪天賜教授捐贈



天淵外紀



談 文 外 門

鄭子瑜 著



香港 世界出版社 印行

門 外 文 談

鄭子瑜著

香港世界出版社印行

香港干諾道中六十號

復興仁記印刷廠承印

九龍馬頭圍道二三二號

代理

星·吉·檳 世界書局

椰 城 大成書局

泗 水 中國書局

1957/6/1—2500

定價港幣一元二角

序

我過着寫作生活逾二十年，出版編著僅十餘種（著作年表詳見前中法漢學研究所編印之英文本「當代中國文學家傳記辭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ers)）。可謂懶於搗管了。其實並不懶，因為那區區的十餘種編著，差不多都是剝奪了我的休息和睡眠的時間寫成的。

二十餘年前在家鄉，爲了身體孱弱，而且長年過着乞食式的生活，絕沒有可以寫作的體力和心力；即使勉強擠出了一二篇，也只能夾在無法貼足郵票的信封裏寄去，能到達編輯先生的案前，已非易事，更哪裏敢希望得其青睞，加以發表，不過姑妄試之而已。我得感謝簡又文先生，因為他將我的處女作發表於他所主辦的「逸經」文史半月刊，使區區者得以在文壇上稍露頭角。「逸經」的撰稿人，如馮玉祥、葉恭綽、馮自由、柳亞子、董作賓、胡懷琛、郁達夫、老舍……等，都是知名之士，只有我是一個搖旗吶喊的無名小卒，以貧乏之身，擠於諸大家之林，又是欣幸，又是恐懼。

然而締婚之樂，當在初夜；後來稿子漸漸發表得多了，同文的那怕是蔡元培、魯迅

和郭沫若，也再不會使我如初登處女作時那樣的覺得「榮幸」了。而我的乞食式的生
活，也不會爲此而稍有改善，只能拿來自我陶醉而已。

但這也並不就虐殺了我對讀書和寫作的興趣。那時候我還只是一個年未弱冠的小小
學生，父親看看讀書寫作並非謀生之道，幾次三番將我寫好的稿子撕碎；但我知道有些
教授的文章不能像我那樣在著名的雜誌發表，由此得到了鼓勵，所以還是要讀和寫，一
直讀到今天，寫到今天。二十餘年了，爲啥讀的還是有限，出版的只有不成樣的十幾
本！這因爲後來一直過着編雜誌和教學的生活，幾乎天天都忙於改文和唱書，哪有時間
讀書寫作呢？有吧，便只有在應該休息之時，或是不眠之夜，人家每晚可以睡足八小
時，而我却經常只能睡兩三小時，最多不過四五小時。如今，對着這不成樣的十幾本著
作，却頗有「敝帚自珍」之概，爲的是得來非易。

這回，給世界出版社編纂這一冊論文集，其中一半是從這十幾本著作中的「剪春
集」「猿嘯與雞啼」「文學與科學的携手」三冊選出來的，一半是近年來在報紙雜誌上
發表的，都是有關於論覽人物或文章的文字，也可以說是比較稍有分量的一冊。「荀子
的宇宙觀」與「左傳的真偽及其作者的研究」是「南洋商報」的星期論文；「談郁達夫
的南遊詩」是在南洋學會學術演講會的演講辭，後來發表於「南洋學報」；「談黃公度

的南遊詩」發表於新嘉坡中國學會年刊；「文學與科學的攜手」「史記的語病」二篇，是應馬來亞廣播電台之邀而作的學術講播辭；「讀簡又文太平天國田政考」發表於「地周刊」；「柳如是」發表於「人間世」；「魯迅的秋夜」發表於香港「學生文叢」，「魯迅詩話再版後記」發表於「南洋青年」；「聊齋志異的成因及其評價」發表於「文藝報」；「說與旁人渾不解」發表於自編的「漣漪文藝」月刊；「文學得攬緊科學的手」發表於「莽草」，後來與「談黃公度的南遊詩」同採入「新標準高中國文」第六冊。

今日海外的出版界，充斥着黃色的讀物，稍有分量的作品，常苦於銷路不佳，無人願意出版。世界出版社只問作品的意義，不一定計較銷路的多寡，慨然接受這本小冊子的出版，我得以這裏表示謝意。但我因為生活的壓迫，和工作的繁重，很少有修養的工夫，對於經傳詩文歷史哲學，至今還在門牆外，不能窺見廟堂之美、室家之富；故所着筆的，只是門外之談而已。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七日鄭子瑜序於新嘉坡。



目次

一	荀子的宇宙觀……………	一
二	「左傳」的眞偽及其作者的研究……………	七
三	談郁達夫的南遊詩……………	一七
四	談黃公度的南遊詩……………	二九
五	文學得攙緊科學的手……………	四〇
六	文學與科學的攙手……………	四六
七	文學作品的「比喻」……………	五〇
八	「說與旁人渾不解」……………	五四
九	「聊齋志異」的成因及其評價……………	五七
一〇	「史記」的語病……………	六一
一一	「魯迅詩話」再版後記……………	六六
一二	魯迅的「秋夜」……………	七三

- 一三 讀簡又文「太平天國田政考」…………… 八七
- 一四 「柳如是」…………… 九一



一 荀子的宇宙觀

荀子在先秦諸子中是一個最特出的人物，他接受了儒家的道統而又批評儒家，他非難諸子百家（見「非十二子」篇），而其實又是集諸子百家之大成；若用現代的術語來說，他對儒家和諸子百家，都是批判地接受的。因為他是最後的一位大師，所以有此便利。荀子的宇宙觀，在先秦諸子中，是最富於唯物主義的因素的。他受了宋尹的天道觀很深的影響；說正確些，他是以儒家經驗論的立場去批判地接受了宋尹的「道」的觀念的。（見杜國庠「先秦諸子思想概要」）。在「解蔽」篇中，他會有這樣的話：

「成湯監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也。文王監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

這種殷監於夏、周監於殷，然後才能代前王而受九州，撫有其地，以收其民的儒家經驗論，分明是從孔子的「周監於二代（夏、殷），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的話（「論語」「八佾」篇）演繹出來的。荀子怎樣批判地接受了宋尹的「道」的觀念呢？宋尹的

所謂「道」，是宇宙本體的道，是神，他的宇宙觀是屬於形而上學的天道觀，而荀子所批判地接受過來的道，却是唯物的，是自然（天）。——試看他的「天論」：

「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所，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

從可知他的所謂「神」，不是上帝，而是自然。他主張利用自然却不依靠自然。在「天論」裏，他又有下列的話：

「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

「所志於天者，已見其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於地者，已見其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於四時者，已見其數之可以事者矣。」

可見萬事全靠人力，盡其在我，不必仰賴天行，也不必畏懼天神的降禍；只要能善用天時與地利，便無往而不自得。他更主張征服天行以爲人用：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裁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代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

（「天論」）

荀子的道，是一元的。他說：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二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亂。」（「解蔽」）

何者爲是，何者爲非呢？自然：得其道謂之是，失其道謂之非。然而，世道常蔽，人不用心，致使：

「德（得）道之人，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

這是他所最感悲痛的一回事。

荀子的道又是整體的，不偏於一隅的。他說：

「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解蔽」）

他以爲這種偏於一隅之道，若自以爲足，便會招致「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的禍害。孔子因爲仁知而且不蔽，所以他的治術足以及先王。不蔽之人，才能得道的整體，用荀子的說法，是「成積」（道由積而成全）。

郭沫若在其「十批判書」中，說荀子的宇宙觀或世界觀是一種循環論。一切自然界

和人事界的現象雖然是千變萬化，但變來化去却始終是在兜圈子，結果依然是沒有變。所以在荀子看來，天地開闢時的情形和今天是一樣的。他更舉出了下列三例以爲証：

「天地始者，今日是也。」（「不苟」）

「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賦篇」）

「以類行雜，以一行萬。始則終，終則始，若環之無端也。」（「王制」）

郭氏以爲這些觀念是從「周易」的「復極必剝，剝極反復」的那種見解脫胎出來的。他說荀子只承認變化而看不出進化，只承認循環而看不出發展。至變化之所由起，也還是歸之於天地陰陽的對立：

「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禮論」）

這是荀子的宇宙觀的一個嚴重的矛盾。因爲我們在他的「解蔽」篇中，却找到了如下的不同於循環論的觀點：

「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經緯天地而材（裁）官萬物……

恢恢廣廣，孰知其極？」

「凡可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可以知之性，求可以知之理……

則沒世窮年不能徧也。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足以浹萬物之變。」

既然說天地萬物，久遠的將來，是恢恢廣廣，不能知其終極的，便不再是變來化去却始終是在兜圈子的循環論了。既然說物理是無窮的（沒世窮年不能知其徧），萬物之變是沒有止境的（雖貫通其億萬之理，猶不能盡），也不復是循環論所能範疇了。

上已說過，荀子的所謂「神」，是自然，而不是上帝，所以他是最反對迷信的：

「夫星之墜，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天論」）

自然界中的各種反常現象，如星墜木鳴，在當時還不能找到科學的說明，覺得可怪，是可以的，但却用不着畏懼，因人力定能勝天；如果能發揮高度的理知，是總有一天可以找到科學的解釋的。在二千餘年前的戰國時代，這真是了不起的偉大思想！

然而，荀子却又贊同「神道設教」的辦法：

「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雨，卜筮而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以為神則凶也。」（「天論」）

雖然明知其無神，又要做做花樣，以為文飾，虛應故事（荀子在「禮論」篇中，又稱這種文飾為「憚詭」），這是行為上的保守，也是儒家一種惰性的表現。由於這保守

行爲（神道設教）的存在，由於這惰性的作祟，所以荀子的所謂神，雖然指的多是天，是自然，但有時也偶爾流露承認上帝的存在的這一種意識。郭沫若在他的「十批判書」中，曾舉出了幾個例子；現在舉其最顯著的一例於後：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齊均。」（「知賦」）
這是荀子宇宙觀的又一個矛盾。

荀子的宇宙觀爲什麼這樣的駁雜和矛盾呢？先已說過，他是春秋戰國時代最末的一個大師，飽嘗諸子百家的學說，學養不純，表現在文字上的自然不免有前後參差的弊病；而且，由於戰國末期社會的變革，反映在思想上的也是一種過渡的思想，所以他的宇宙觀也是過渡的。這就說明爲什麼郭沫若指出荀子的宇宙觀是一種循環論，而我却能在他的作品找到了近於進化論的例子，同時也說明荀子的所謂神是自然但有時又是上帝的矛盾之由來。

一九五六年三月四日「南洋商報」星期論文。

二 「左傳」的真偽及其作者的研究

現行的「左傳」，原名「左氏春秋」，所謂「春秋左氏傳」，乃是劉歆妄改的名稱，後來的人遂簡稱之爲「左傳」。這一部上接「尚書」，下開「國策」的作品，從文學的觀點來說，它的寫作技巧確有驚人的成就，給予後世散文文學的影響至鉅；從史學的觀點來說，它廣徵博引，對於當時政治的演進，文化的進展，以及典章文物等都有極關周詳的記載，故能自成一家之言。凡要研究春秋的歷史者，不可不精讀此書，不能因爲漢儒的附益改竄，而否定了它在文學上和史學上的價值。

這一部希世的鉅著，自漢、魏以來，二千年間，研究者輩出。可惜作者的姓氏、創作的年代及其書的真偽問題，直到今日，仍是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經古文學家以爲是秦以前的作品，經今文學家却又以爲是漢時的僞作。古文學家所根據的，是「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漢書、藝文志及劉歆傳」和晉杜預的「春秋經傳集解」，諸作都說「左氏春秋」是與孔子同時的左丘明所作。惟清儒崔適疑「史記」的話係後人所竄入（見「史記探源」）。近人周予同又謂「漢志」本襲劉歆「七畧」，歆爲經古文學的開

創者，主張「左傳」爲左丘明所作，乃是必然的事，不足以服今文學家的辯論；而杜預偏袒「左氏」，不在劉歆之下，所以他的話也沒有信史的價值（見「羣經概論」）。

西漢末年，今文學博士反對古文學家劉歆，曾有「左氏不傳『春秋』」之辯（見歆「移讓太常博士書」）。清皮錫瑞「春秋通論」，亦以爲「漢博士謂左丘明不傳『春秋』，范升謂左氏不祖孔子，必是實事而非妄矣」。皮氏更引張杓的話，以證左氏之傳，非訓詁之傳，乃載記之傳。案「左傳」與「春秋」本是分行的，至晉杜預始以傳附經，而那些解經的文字，大抵是劉歆所附益的。唐趙匡「春秋集解纂例、趙氏損益義」云：

「舊說以左氏爲丘明，受經於仲尼；今觀左氏解經，淺於公、穀，誣謬實繁，若丘明才實過人，豈宜若此？推類而言，皆孔門後之人，但公、穀守經，左氏通史，故其體異耳……焚書之後，莫得詳知，學者各信胸臆，見傳及『國語』但題左氏，遂引丘明爲其人。……劉歆以私意所好，編之『七畧』；班固因而不革，後世因以爲真。」

近人劉逢祿、康有爲都說劉歆把「國語」中的一部分抽出，改國別體爲編年體；加上一些解經的句子，號爲「春秋左氏傳」（康說見「新學僞經考」，劉說見「左氏春秋考證」）。康氏且謂「歆託於丘明而申其僞傳，於是尊丘明爲魯君子，竄之『史記』十

『二諸侯年表』中，又稱與孔子同觀魯史，僞『古論語』又稱孔子與丘明同恥，蓋歆彌縫周密者也。」又謂：「司馬遷作史多採『左氏』，若左丘明誠傳『春秋』，史遷安得不知？」蓋「漢書、司馬遷傳」「史記、太史公自序及報任安書」，凡三言左丘明，俱稱「國語」，是則「左丘明所作，史遷所據，『國語』而已，無所謂『春秋傳』也」。

晚近勇於疑古的學者，甚至以爲「左傳」全書都是由劉歆一人僞造出來的，或是由漢初學者創作的。惟瑞典人珂羅佩倫（Bernhard Karlgren）著「左傳之真僞及其性質」一書，國人陸侃如譯爲「左傳真僞考」，對此說却頗持異議。氏謂：「『史記』內有數十段與『左傳』意義相同而文字微有歧異者。……其採用當係『左傳』之原本。……遷父子去藏書解禁之時（前一九零年）不遠，若此書爲焚書以後之僞作，遷父子不易受欺，故信爲焚書前之作。」

「四庫提要」亦云：

「自劉向、劉歆、桓譚、班固皆以『春秋傳』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經於孔子，魏、晉以來，儒者更無異議。至唐趙匡始謂左氏非丘明，蓋欲攻傳之不合經，必攻作傳之人非受經於孔子，與王柏欲攻『毛詩』先攻『毛詩』不傳於子夏，其智一也。朱子謂『虞不臘矣爲秦人之語』，葉夢得謂『記事終於知伯，當爲六國時

人』，似爲近理。然考『史記、秦本紀』稱惠文君十二年始臘，張守節『正義』稱秦惠文王始效中國爲之，明古有臘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創。……經止獲麟，而弟子續至孔子卒；傳載知伯之亡，殆亦後人所續。……今仍定爲左丘明作，以祛衆惑。」

實則漢代今文學博士早有「左氏不傳『春秋』」之語，已見前述，非無異議。至「提要」辯朱子以爲「左傳」有「虞不臘矣」之語，便說是秦時文字之惑，却頗有價值。近人衛聚賢亦有是說。考「左傳補釋」與「禮記、禮運」，都有「仲尼與於蜡賓」之句，臘亦謂之蜡，是春秋時已有臘祭之禮了。又「提要」以「左傳」記事終於知伯之亡，殆亦後人所續，亦有可能。惟以此定「左傳」爲左丘明作，則似嫌牽強附會，不足以信服於人。

清儒顧炎武「日知錄」，間亦論及「左氏」，云：「『左氏』之書成之者非一人，錄之者非一世，而夫子當時未必見也」。「左氏」成書既非一人一世之事，則其原作者爲何人，續之者爲何人，當爲治「左氏」學者所不可不研究的問題。「左氏」原作者非「論語」所稱引之左丘明，前已畧述之矣，其餘的留待以後再作討論。至於續作的人，前已指其爲漢代學者劉歆，但除了劉歆一人之外，可能還有別的人，大抵爲漢儒（至晉

杜預手亦當有若干改動)。獨趙汴「春秋師說」引戴宏序「春秋」傳授，以公羊氏五世傳「春秋」，因推論「左氏」之末年傳文亦當是子孫所續，故通謂之「左氏傳」。殊不知戴宏之序「春秋」傳授，證據薄弱，何可據以推論？

關於「左氏」傳授及後人附益之說，桐城姚姬傳「全集、左傳補注序」亦曾提及，云：「『左氏』之書，非出一人所成。自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虞卿傳荀卿。蓋後人屢有附益，其爲丘明說經之舊，及爲後人所益者，今不知孰爲多寡矣。」

梁任公嘗著「古書真僞及其年代」一書，其分論「左氏傳」，有云：「據我看，『左氏』與『國語』的體裁和文章都各不相同，并無割裂的痕跡。從戰國到西漢末年，稱引『左氏』的不止一書，可見『左氏』不是劉歆僞造或從『國語』分出來的。」似乎不特未祖述其師康長素考僞經之說，且頗有異議；但他對於「左氏傳」的作者，則亦以傳中有趙襄子之諡，而斷其必非爲春秋時代的左丘明。梁氏最後說：

「假使我們把解經的或假添的鈎去（經過很細密的考證之後），那麼，『左氏』還是一部真書呢！」

實在是比較公允的說法。

「左傳」作者爲何時人這一問題，前已引述各家的辯論文字，其最膽炙人口者，爲以「左傳」紀知伯之事，及提趙襄子之諡，斷左氏爲六國時人之說。鄭樵「六經叢義」，亦有同樣的說法。此外，鄭氏更另舉七驗，以爲左氏非丘明，而爲六國時楚人之證。但所驗各點，若果爲後人所續者，則因此而得之論據，俱成空說，亦徒勞而無功矣。

衛聚賢作「左傳的研究」，以「左傳」言魏子「其長有後於晉國乎」，謂左氏如見魏斯爲侯，則應說「其長有後於魏」，是著者爲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魏斯爲侯以前的人。胡適之嘗力駁其說，謂從「左傳」本身的文字看來，作者實親見三家分晉與田和代齊，故此書著作者年代，當移後。至早在前四〇三年三晉爲諸侯之後，或竟在前三八六年田和爲諸侯之後。（見「左傳真僞考提要與批評」）。

各家之說，以左氏爲戰國時人者居多，是皆參用「左傳」本身之證據。胡適之且以爲要研究「左傳」，非循此道不可。我以爲胡氏的方法，尙欠完善，大有補充的必要，卽是：所引用「左傳」本身的證據，須百分之一百爲左氏的原文，而非爲後人所附益改竄者。倘偶一不慎，誤引僞文，據以斷論左氏的年代，豈不是十分危險的事？故胡氏所沾沾自喜，據以推論「左傳」著作之年代者，是否真實可靠，絕無誤引僞文，還是大有問

題。愚意研究「左傳」的年代，若參用「左傳」本身的證據，須先棄其僞文，正其改竄，以復左氏之舊，庶不致謬據僞文，妄爲臆說，以訛傳訛。

年代既遠，古書存者有限，故對於已佚之「左傳」作者真姓名，至今尙無法考出。但決非爲「論語」中之左丘明，後來學者，似已公認，而少有異議者。顧元趙汭著「春秋師說」，以「左傳」文字，與戰國時文字比較，仍定左氏爲春秋時史官，孔門弟子，但不定其名字。這實開瑞典人珂羅儂倫從「左傳」的特別文法組織，比較他書，以研究「左傳」作者問題的方法之先河。不過趙氏着眼在時間（著作的年代）而珂氏却着眼在空間（作者的國籍）罷了。（珂說見後）

漢儒所謂「左傳」作者之左丘明，是姓左名丘明呢？還是姓左丘名明呢？考「通志、氏族畧」云：「左，姓也，齊公族有左右公，因以爲氏。」或謂左氏乃楚左史倚相之後。顏師古云：「左丘明，魯之左史，繼守其職，遂爲姓。」惟「元和氏纂」却云：「齊國臨淄縣有左丘。」「氏族博考」亦云：「左丘明，居左丘，爲左丘氏」。鄭樵「六經奧義」據此謂「『論語』之左丘明居於左丘，以地爲氏者。」劉寶楠「正義」云：「『史記、太史公自序』：『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史公以左丘連文，則左丘是兩字氏，明其名也。左丘亦單稱左，故舊文皆言左傳，不言左氏傳。」是左丘明氏

左或左丘，已不必再辯了。

程端學「春秋本義」云：

「宗左氏者，以爲丘明於仲尼，所謂好惡與聖人同者；然左氏大旨多與經戾，安得以爲好惡與聖人同乎？觀孔子所謂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乃竊比老彭之意，則其人當在孔子之前……說者以爲與聖人同者爲左丘明，而傳『春秋』者爲左氏，蓋有證矣。」傳「春秋」者既非失明而作「國語」之左丘明，究係二人姓名之偶同呢？抑另有左而名非明者呢？趙匡謂「自古豈止一丘明姓左乎，何乃見題左氏，悉稱丘明？」（「春秋集傳纂例、趙氏損益義」）。是「左傳」作者氏左未必名爲丘明者。趙氏甚至以爲「論語」之左丘明亦非失明而作「國語」之左丘明。章太炎嘗駁其說云：「若左丘明果有二人，可以自漢至唐，茫不瞥省？」（「章氏叢書、春秋左傳讀叙錄」。）

瑞典人珂羅佩倫，與胡適之有同樣的主張，以爲研究「左傳」，應注意「左傳」的本身。故從文法上加以研究，假定「左傳」的語言爲左語，「論語」「孟子」的語言爲魯語，以察「左傳」是否用魯國的語言。選定「若」「如」「斯」「乎」「與」「及」「於」（「于」）等七種助詞，爲比較的標準，結果發現「左傳」的文法，與「論語」「孟子」的文法頗不同，故斷定「左傳」非孔門弟子作，亦非司馬遷所謂「魯君子」

作，因為它不是魯語。而「左傳」文法一致，可見係一人或同一學派中同鄉數人所作。

又以「左傳」與他書比較，觀其文法上的同異，結果在周秦和漢初書中，無與「左傳」文法組織完全相同者，惟「國語」最爲接近（據張心澂編著「僞書通考」所引述）。

衛聚賢謂「論語」「孟子」與「左傳」助詞用法之稍異，只可證明著作時間的不同，不足以證明空間之有別，故珂氏所見實爲不然。愚意珂氏研究的方法是很科學的，其說亦不無相當的價值，但却自相矛盾。趙匡連「國語」亦以爲非與夫子同耻之左丘明所作，章氏已辯其妄，且「國語」爲魯人所作，至今尙無異議；「左傳」文法既與「國語」最相近，何以獨非魯人所作？

衛氏據「韓非子」及「國策」，以爲左氏乃地名而非人姓名，梁啓超謂其說大有價值。章太炎亦有是說。

衛、章二氏，以「春秋」爲左氏人吳起所傳，故名曰「左氏春秋」作者可能并非氏左，這在「左傳」作者的研究上確是一大發明。衛氏更從著者的環境，舉子夏爲「左氏春秋」的作者，謂子夏在魏西河時作。胡適之力抨其說之非當，鮮見「左傳眞僞考提要與批評」，這裏恕不稱引了。

「左傳」作者，是否爲孔子弟子呢？趙沅「春秋師說」云：「左氏是史官曾及孔氏

之門者。古者竹書，簡帙重大，其成此傳，當閱多少文字，非史官不能如此之詳，非及孔氏之門，則聖人不能如此之焉。「衛聚賢『左傳的研究』」，亦云：「『公羊』『穀梁』列經至西狩獲麟止，而『左傳』續經至孔子卒，對於孔子及門弟子無貶毀之詞，則著者與孔子有關。」或以「左傳」有不合經者，斷其作者必非孔子弟子，而不知這正是弟子史學觀念的進步。考「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無左丘明名。「左氏春秋」之左氏，若果由地而得名，則著者未必氏左，不知爲仲尼弟子中之何人，殊難稽考；但若由左公而得名，則作者不論爲單字姓或複字姓，必有一「左」字。又可考仲尼弟子中其氏有一左字者惟左人郢一人，「仲尼弟子列傳」但云：「左人郢，字行」，「集解」引鄭玄曰：「魯人」。案「左人」係以地爲氏者，其地在今河北省唐縣，爲鮮虞故邑，卽「列子」所記「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狄，取左人、中人」之左人。「左傳」是否卽左人郢所作，以其事蹟不詳，無法斷定，只能說是有可能而已。

一九五六年七月廿二日及九月廿三日「南洋商報」星期論文。

三 談郁達夫的南遊詩

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南洋學會假新嘉坡中國銀行大廈十五樓餐廳舉行座談會，由會員高維廉先生主持，邀請著作學術演講，講題為「郁達夫的南遊詩」，本篇即為當日的

講辭。

郁達夫先生，是南洋學會的發起人之一（其餘的四位發起人是許雲樵先生，張禮千先生，姚楠先生，關楚璞先生），自從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在蘇門答臘被日本憲兵殺害，到現在已足足十個年頭了。今天，我來講這個題目：「郁達夫的南遊詩」，一則可以說是來記念他，一則是來向諸位求教。在座各位，有的是博士、專家，有的是郁先生的舊同事、老朋友，都是學術界的老前輩，相信是很樂意來指教我的。

郁達夫先生，又是一代的文藝作家；歷來的批評家和讀者，大多以為他是一個「頹廢派」的文人，這是只見到達夫先生的一面而不能深一層的了解達夫先生的看法。記得創造社的李初梨先生，曾指出達夫先生是「摩登的頹唐派，本質的清教徒」。郭沫若先生以為「這話最能够表達了達夫的實際」。他的「論郁達夫」一文，也曾有過這樣的評

語：

「在創造社的初期，達夫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他的清新的筆調，在中國的枯槁的社會裏面好像吹來了一股春風，立刻吹醒了當時的無數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對於深藏在千年萬年的背甲裏面的士大夫的虛偽完全是一種暴風雨式的閃擊，把一些假道學假才子們震驚得至於狂怒了。爲什麼？就因爲有這樣露骨的真率，使他們感受着作假的困難。」

這所謂「起了很大的作用」，主要的是指達夫先生的創作小說而言。至於他的日記、遊記和詩，「那大胆的自我暴露」，也還不是一樣的；而且因爲形式的便利，有時甚至還要暴露得更徹底，更積極！這「自我暴露」的發展，便是「偽裝頹唐」之形成。所以郭沫若先生的「論郁達夫」，又有這樣的話：

「他的缺點是身體太弱，似乎在二十幾歲的時候便有了肺結核（子瑜案：一九三三年達夫先生遊南高峯詩，有「病肺年來慣出家」之句，可以爲證），這使他不能勝任艱劇。還有一個或許也是缺點，是他自謙的心理發展到自我作賤的地步。愛喝酒，愛吸香煙，生活沒有秩序，愈不得志愈想偽裝頹唐，到後來志氣也就日見消磨，遇着什麼棘手的事情，便萌退志。」

達夫先生的一生就從來沒有得志過，「愈不得志愈想偽裝頹唐」，於是便招來不少物議。然而「達夫在暴露自我這一方面雖然非常勇敢，但他在迎接外來的攻擊上卻非常的懦弱。」所以「他很感覺着孤獨，有時甚至傷心。」因為這緣故，「他不得不縱情在醇酒婦人中，希望能找到暫時的寄託。」（見連士升先生「悼念郁達夫」一文。）而「壯志消磨」，又時常表露在他的作品——特別是詩的上面。

達夫先生一生所作的詩，散見於國內外的報紙、雜誌上以及他的文集集中的，大都已收入拙編「達夫詩詞集」一書中。現在只想跟諸位來談談他的南遊詩。

達夫先生的南遊詩，據拙編所收的，七言律詩有「感懷」一首，「南天酒樓餞映霞」二首，「送映霞歸國」一首，「贈韓槐準先生」十一首——「中秋」一首，「無題」四首，「步胡邁原韻」一首，以及「亂離雜詩」十一首，此外，尚有「星洲聞楊雲史先生之訃」一首（見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三日「星洲日報」李冰人先生作的「郁達夫的遺作和佚詩」一文），為拙編所未曾收入的；七言絕詩有「題悲鴻畫梅」一首，「贈郭氏嘉東椰園照後」一首，「贈郭小姐開菊開蘭姊妹」一首，「題徐悲鴻為韓槐準作喜馬拉雅山遠眺圖」一首，「題徐悲鴻贈韓槐準雞竹圖」一首，「止園餞送徐教授悲鴻席上偶成」一首，「題陳月秀女士廬山圖」一首，大都是題畫之作——此外，為拙編所未及搜入的

有「登板城升旗山」二首；至於五言律詩，則只有「一九四二年星洲既陷，蘇島孤舟中所作」的一首而已。

在這寥寥三十餘首的南遊詩中，最早寫成的一首大約是「感懷」：

「六陵遙拜冬青樹，笑擲乾坤再出家，缺有寒光消鬱怒，集無名句比愁笳，朝雲未劫終塵土，楊愛前身是柳花，參透色空真境界，一瓶一鉢走天涯。」

這詩末二句似乎有逃禪之意。在抗戰前，達夫先生怎樣的熱戀着王映霞女士，怎樣的把她「據爲己有」，這在他的「日記九種」中是說得詳詳細細的。可是在戰時，達夫先生初任職於福建省政府，後來政治部在武漢成立，達夫先生得沫若先生之薦，去做設計委員，與日本反戰作家鹿地亘共事，這期間，他竟和王映霞女士發生了家庭的糾葛：起先，是映霞熱戀着浙江省的教育長官許××；後來，許某另戀着一個未婚少女孫××（原是徐悲鴻先生的愛人），和映霞女士漸漸冷淡了。一九三八年，達夫先生應「星洲日報」之聘，決定了隻身去國之計，映霞女士忽又從浙江趕到，說要痛改前非，跟達夫先生南渡；這時的達夫先生，老母死於杭州，兄曼華先生在滬被日寇殺害，頗感身世之淒涼，所以也就不念舊惡，只高唱了一闕「賀新郎」詞：

「憂患餘生矣，縱齊傾錢塘潮水，奇羞難洗。欲返江東無面目，曳尾塗中當死。

恥說與，衡門牆茨。親見桑中遺芍藥，學青盲，假作痴聾耳。姑忍辱，無多事。匈奴未滅家何恃？且由他，鶯鶯燕燕，私歡彌子。留取吳鉤拚大敵，寶劍豈能輕試？殲小醜，自然容易。別有戴天仇恨在，國倘亡，妻妾寧非妓？先逐寇，再驅雉。」到底和她一同到星洲來了。

後來達夫先生把他們夫妻的糾紛做了一篇詩話式的「毀家詩記」，在香港的「大風」半月刊發表出來，其中的一些詩詞，可以稱爲絕唱（現收入拙編「達夫詩詞集」中）；但人家是家醜不可外揚，而他說不定還要誇張家醜（據郭沫若先生語），這給王映霞女士實在太難堪了。所以到了一九四〇年的秋天，映霞女士終於背棄了達夫先生，離星返國。臨行的前夕，達夫先生曾假南天酒樓爲映霞女士設宴餞行，并卽席做了幾首律詩來送她，最哀艷動人的兩首是：

「自剔銀燈照酒卮，旗亭風月惹相思，忍拋白首名山約，來譜黃衫小玉詞。南國固多紅豆子，沈園差似習家池。山公大醉高陽夜，可是傷春爲柳枝。」

「大堤楊柳記依依，此去離多會自稀。秋雨茂陵人獨宿，凱風棘野雉雙飛；縱無七子爲哀社，尙有三春各戀暉。愁聽燈前兒輩語，阿娘真個幾時歸？」

映霞女士回國之後，達夫先生更感身世的孤寂，常常懷念着北國的舊友，所以在第

二年（一九四一）的中秋，他又做了這樣的一首律詩：

「三湘刁斗愛淒清，舉目中秋月正明，索句深宵人寄感，傾杯對坐客多情，每懷舊雨天涯隔，尚有疑雲海上生，圓缺竟何關世事，江流不斷咽悲聲。」

這些都是在無聊抑鬱之時要想解除抑鬱的一種窮開心的表現。我在「達夫詩詞集」的序文裏說：「達夫先生的詩，受黃仲則的影響甚深，而其辛酸或甚於仲則。至其縱橫的才華，瀟灑飄逸的神韻，則尤非仲則所能幾及。」他的歷史小說「采石磯」，便是假借黃仲則的故事為題材寫成的。達夫先生嘗說：「今人作詩，只能於說理、使辭、排韻、鍊句，勝過前人，至若意境，則遠遠不如漢、魏、六朝，因為我們既沒有古人的閒適，又沒有古人的冲澹。」又說：作詩沒有什麼祕訣，如有，只得一個，那便是意境須一大一小，一小一大，便有錯綜變化之妙。」他的詩，就很可能做到這一點。

達夫先生是創造社的健將之一。魯迅先生以為創造社的作家，大都有那麼一副「創造相」，使人不喜歡親近他；只有達夫先生是最好親近的人物，大約是他那副「創造相」沒有那麼濃厚吧？據說有一次，上海左翼作家聯盟開會，一些青年作家打算「杯葛」郁達夫，魯迅先生說：「郁達夫的行爲，是可以解釋的。」青年作家們立即改變了態度。可是女作家蘇雪林氏，對於達夫先生的頹廢生活，却認為是無可原諒的。據「人間世」

所載達夫先生給林語堂博士的信說：「有一次，暨南大學打算聘我任教，某女作家聽到了這個消息，趕快上書教育部，說我行爲浪漫，不足爲人師。教育部長王世杰竟着令暨南大學不得聘請我爲教授。」（大意）書中所提的女作家，大約指的是蘇雪林女士。蘇女士有沒有上書教育部，我們不得而知，很可能是達夫先生的捕風捉影；但教育部令暨南大學不得聘郁達夫爲教授，却是事實。這消息傳到了日本，郭沫若先生知道了，感到了異常的驚訝！他是很替達夫先生不平的。胡愈之先生在「郁達夫的逃亡和失蹤」一書裏說：「沒有親近過達夫先生的人，都以爲達夫先生的生活是頂浪漫的；待和達夫在一起之後，才知道他的生活是頂嚴肅的，他對工作又是非常勤謹的，不然，等身的著作將從何而來？」（大意）都是替達夫先生解釋的話。

達夫先生的南遊詩，最值得我們稱頌的，還是那對於家國的興亡之感。其「贈韓槐準先生」詩云：

「賣藥蘆中始識韓，轉從市隱憶長安，不辭客路三千里，來啖紅毛五月丹，身似蘇髯羈嶺表，心隨謝羽哭嚴灘，新亭大有河山感，莫作尋常讌會看。」

又「無題四首」其三云：

「贅秦原不爲身謀，攬轡猶思定十州，誰信風流張敞筆，曾鳴悲憤謝翱樓，彎

弓有待山南虎，拔劍寧慚帶上鉤，何日西施隨范蠡，五湖煙水洗恩仇。」

易家鉞先生說達夫先生是一個「愛國詩人，暴日侵凌前後，其所作多同仇敵愾之什。」然而，達夫先生究竟是一個意志消磨了的人，所以他的詩篇，有時表現着磅礴的氣概；有時却又無限的感傷和頹唐，如「步胡邁原韻」一詩云：

「故人橫海寄書來，辭比江南賦更哀，舊夢憶同蕉下鹿，此身真似劫餘灰，歡聯白社居千日，淚灑新亭酒百杯，衰朽自憐劉越石，只今起舞要雞催。」

詩中提到了南北朝庾信的「哀江南賦」。庾信，身仕北朝，不忘南國，然而他不能效蘇武持節牧羊，只說了些「鶴訝今年之雪，龜言此地之寒」的可憐話。杜甫詩云：「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哀感動江關。」近人宋雲彬先生以爲他只是「哀感」而已，談不到什麼氣節。

詩中又引列子「蕉鹿夢」。「列子」乃一偽書，當爲魏晉時人所作，代表着魏晉文人的哲學思想。魏晉的文人，感於時代的苦悶，每放浪形骸，又生怕人家的攻擊，於是便僞作了列子的「楊朱」諸篇，使自己的思想行爲，變成爲「有所本」。達夫先生多少沾染着魏、晉文人的消極厭世的人生觀！

這詩作於一九四四年，其時達夫先生與一批文化人，改名換姓（達夫先生改名「趙

廉」)，化裝爲生意人，避難於蘇門答臘的鄉間，開了一爿酒店，來維持生活。不意在
日本投降後的一天夜裏（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達夫先生竟被日本憲兵殺害了！這
是我們一個無可補償的損失。「南洋學報」主編許雲樵先生曾爲文悼念。現在將達夫先
生最後所作的「亂離雜詩」十一首，著錄於後：

亂離雜詩

一
又見名城作戰場，勢危疊卵潰南疆；空標王謝迷飛燕，海市樓台咒夕陽。縱欲窮荒求玉杵，可
能苦渴得瓊漿？石壕村與長生殿，一例釵分惹恨長。

二
望斷天南尺素詩，吧城消息近何如？亂離魚雁雙藏影，道阻河梁再卜居。鎮日臨流懷祖逖，中宵
舞劍學專諸；終期舸載夷光去，鬢影煙波共一廬。

三

夜雨江村草木欣，端居無事又思君；似聞島上烽煙急，只恐城門玉石焚。誓記釵環當日語，香餘
繡被隔年熏；蓬山咫尺南溟路，哀樂都因一水分。

四

謠諑粉紵語迭新，南荒末劫事疑真；從知邗上終兒戲，坐使咸陽失要津。月正圓時傷破鏡，雨淋鈴夜憶歸秦；兼旬別似三秋隔，頻擲金錢卜遠人。

五

久客愁看燕燕飛，呢喃語軟洩春機；明知世亂天難問，終覺離多會漸稀。簡札浮沉殷羨使，淚痕斑駁謝莊衣；解憂縱有蘭陵酒，淺醉何由夢洛妃？

六

却喜長空播玉音，靈犀一點此傳心；鳳凰浪跡成凡鳥，精衛臨淵是怨禽。滿地月明思故國，窮途衰敝感黃金；茫茫大難愁來日，剩把微情付苦吟。

七

猶記高樓訣別詞，叮嚀別後少相思；酒能損肺休多飲，事決臨機莫過遲。漫學東方耽戲謔，好呼南八是男兒；此情可待成追憶，愁絕蕭郎鬢漸絲。

八

多謝陳蕃掃榻迎，欲留無計又西征；偶攀紅豆來南國，爲訪雲英上玉京。細雨蒲帆遊子淚，春風楊柳故園情；河山兩戒重光日，約取金門海上盟。

九

飄零劍下巴東，未必蓬山有路通；亂世桃源非樂土，炎荒草澤盡英雄。牽情兒女風前燭，草檄書生夢裏功；便欲揚帆從此去，長天渺渺一征鴻。

十

千里馳驅自覺癡，苦無靈藥慰相思；歸來海角求風日，却似隆中抱膝時。一死何難仇未復，百身可贖我奚辭？會當立馬扶桑頂，掃穴犁庭再誓師。

十一

草木風聲勢未安，孤舟惶恐再經灘；地名未且埋蹤易，楫指中流轉道難。天意似將頒大任，微軀何厭忍飢寒？長歌正氣重來讀，我比前賢路已寬。

「亂離雜詩」是達夫先生生平最佳的詩作，用典切當，筆調清新，文情並茂。從這些詩篇裏，我們可以看到詩人豐富的想像力；更可以看出他在感傷淒楚之餘，也有嚴肅、悲憤、慷慨之致。至各章所流露出來的家國之思，鄉園之感，尤足以動人肺腑；胡愈之先生在「郁達夫的逃亡和失蹤」一書裏，曾替「亂離雜詩」作「跋」云：

「右詩一至七首爲懷遠憶舊之作。達夫有女友，於新嘉坡陷前，撤退至爪哇，任聯軍廣播電台廣播員；達夫在保東村，隔二三日必赴附近市鎮，聽巴城廣播，故

有『却喜長空播玉音』之句。第八第九首留別保東居停主人陳君，陳爲閩金門人。第十首成於鼓鶴嶺，則以言志。十一首係去卜干峇魯口占，未且爲中途停舟處。達夫後居巴爺公務時，亦間有所作，作風復有不同，似意氣較豪放，惟已盡散佚，惜哉！」

如今，達夫是已經成爲過去的人物了，說一句公道話：我們不能贊成他的行爲，却不能不同情他的遭遇。然而，我們對於達夫，是不能有所留戀的，因爲達夫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也應該讓他過去了。

——「南洋學報」第十二卷第一輯。

四 談黃公度的南遊詩

所謂舊瓶裝新酒，是在舊格調中放進新的內容去，實始倡於清末遵憲黃公度（1848—1905），這是人盡皆知的事。魯迅也以爲舊瓶是可以裝新酒的（見「重三感舊」一文，「全集」第五冊第七三三頁）。可是他的弟弟周作人，却持着相反的意見：

「舊詩裏大有佳作，我是承認的，我們可以賞識以至禮讚，却是不必想去班門弄斧。要做本無什麼不可，第一賢明的方法恐怕只有摹仿，精時可以亂真，雖然本來是假古董。若是託詞於舊皮袋盛蒲桃酒，想用舊格調去寫新思想，那總是徒勞。這只是個人的偏見，未敢拏了出來評隲古今，不過我總不相信舊詩可以變新，於是對於新時代的舊詩就不感到多大興趣。」（見「逸經」第二十五期「入境廬詩草」一文。）

然而周作人所敬重的黃公度，却是極口反對作詩必摹仿前人的。其所著「入境廬詩草」，原有「自序」一篇。公度作古之後，其家人始以其詩稿交梁任公代爲付梓。任公竟將公度「自序」一文刪去，而易以自撰的「嘉應黃先生墓誌銘」。直到一九二六年，公

度的文孫延凱，才將序文檢出，交與吳宓，在「學衡」第六十期發布出來，那裏面說：

「士生古人之後，古人之詩號稱專門名家者無慮百數十家。欲棄去古人之糟粕而不爲古人所束縛，誠憂憂其難！雖然，僕嘗以爲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今之世異於古，今之人何必與古人同。……其述事也，舉今日宦書、會典、方言、俗諺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耳目所歷，皆筆而書之。其練格也，自曹、鮑、陶、謝、李、杜、韓、蘇迄於晚近名家，不名一格，不專一體，要不失乎爲我之詩，誠如是，其亦足以自立矣！然余固有志而未逮也。詩有之曰：『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聊書於此以俟他日。」

未署：「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年）六月在倫敦使署公度自序。」從這序文裏，我們已可窺見公度固欲以舊瓶裝新酒，「自立」而「爲我之詩」自許者；「摹仿」云云，自是他所深惡而痛絕之的。

我手邊的「人境廬詩草」十一卷，爲陳育崧所珍藏，辛亥日本印本，計四冊，末附公度五弟遵楷的跋文一篇，中有云：

「其於詩也，雖以餘事及之，然亦欲於古人之外，自樹一幟。……要不失爲以我之手，寫我之口云。先兄病篤之書，謂平生懷抱，一事無成，惟古近體詩能自立

耳；然亦無用之物，到此已無可望矣。」

公度於一九〇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以疾卒於家，故彌留時給他五弟的信，亦當寫於是年，距作「人境廬詩草自序」僅十四年，他的作詩，已由「嚮往」自立而至「能」自立了。至「以我之手，寫我之口」，自是今日一些號稱爲詩人者所不可不服膺的話。

梁任公撰「嘉應黃先生墓誌銘」亦云：

「先生讀書，有精識遠見，不囿於古，不徇於今。……先生爲文章，務取暢達，不苟爲誇飾。至其爲詩，則精思渺慮，陽開而陰合，千變萬化，不可端倪，於古人詩中，獨具境界。」

這所謂「不囿於古」和「獨具境界」，實是公度在文學上的成功之要點。

古今文人，有專靠他在文學上輝煌的造就而成名者；有靠他的經世濟事之才，幹過了轟轟烈烈足以彪炳千秋的事業，本已煊赫一時，不問他的文學造詣如何，一有所作，人必爭傳誦之者。雖然周作人說佩服黃公度是「佩服他的見識與思想，而文學尙在其次」（見所撰「人境廬詩草」一文）；梁任公也說公度「一身之進退死生，與一國之榮悴兮相依。……若乎文章之在人耳目者，則乃其平生所不屑爲」（見所撰公度墓誌銘）；更有人說公度「足跡遍四大洲，多年辦理外交、觀察政治之閱歷，貫通中外古今之學

識，辦事精細審密之才幹，且在羣賢之上。其於詩，祇因篤好深嗜，故以餘力及之，未嘗欲立志爲詩人。」似乎都說公度在經濟上的成就，實遠過他在文學上的造詣。但是諸君若肯細讀公度詩，便知道公度實兼具經濟和文學的才調。汪辟疆在「光宣詩壇點將錄」裏，說公度「有改革詩體之志，其成就雖未能副其所期，然一時鉅擘矣。」翁同龢日記謂公度「詩文俱佳」。李鴻章亦許以霸才。胡適之則推爲清末第一大詩人。皆真能識公度之文學天才者。公度固不因其參與維新運動爲光緒所器重，及其在內政外交上種種的成就而揜沒其詩才，這是有他的「日本雜事詩」和「入境廬詩草」爲證的。

公度的著作最爲人所熟知的自然是「入境廬詩草」。內收他的自哀集六百餘首，「自其少年，稽古學道，以及中年閱歷世事，暨國內外名山水與其風俗、政治、形勢、土物，至於放廢而後，憂時感事、悲憤伊鬱之情，悉託之於詩。」（「嘉應黃先生墓誌銘」。）這裏爲着題目和篇幅的限制，只想向讀者介紹他的一些南遊詩。

公度於一八七〇年初次抵香港，時年僅二十三，目擊種種怪現狀，不勝感慨，因作「香港感懷」詩十首，極哀艷動人，茲錄其中四首於後：

「沸地笙歌海，排山酒肉林，連環屯萬室，尺土過千金，民氣多癩行，夷言學鳥音，黃標千萬積，翻訝屋沉沉。」

「便積金如斗，能從聚窟消，蠻雲迷寶髻，脂夜蕩花妖，龍女爭盤鏡，鮫人鬥織綃，珠簾春十里，難遣可憐宵。」

「博物張華志，千間廣廈開，摩挲銅狄在，悵望寶山回，大鳥如人立，長鯨跋浪來，官山還府海，人力信雄哉。」

「指北黃龍飲，從西天馬來，飛輪齊鼓浪，祝礮日鳴雷，中外通喉舌，橫縱積貨財，登高遙望海，大地故恢恢。」（「人境廬詩草」卷一第十至十二頁。）

愛國熱情，躍然紙上。而對於當時香港畸形的發展，繁華的情形，與夫一些紙醉金迷的可憐人物，都刻劃得很到家。

一八九〇年（光緒十六年），薛福成使英，堅邀公度同行，昇二等參贊職。星槎過香港，公度携一子一僕，自嘉應來歸，又有「香港登舟感懷」詩云：

「又指天河問析津，東西南北轉蓬身，行行遂越三萬里，碌碌仍隨十九人，久客暫歸增別苦，同舟雖敵亦情親，龍旗獵獵張壇去，徒倚闌干獨愴神。」（「人境廬詩草」卷六第一頁。）

過安南西貢，「有感」五絕，茲錄其三：

「高下連雲擁百城，一江直朔到昆明，可憐百萬提封地，不敵彈丸一礮聲。」

「神功遠拓東西極，聖武張皇六十年，不信王師倒戈退，翻將化外棄南天。」

「班超投筆氣如山，萬里封侯出玉關，今豈無人探虎穴，寶刀難染血痕斑。」

（「人境廬詩草」卷一第一至二頁。）

其時距法軍侵畧安南之後，只有五年，我們的愛國詩人黃公度，隨船過西貢，自難免有所感慨。惟詩中有「神功遠拓東西極」之語，又提到了班超萬里封侯，若自今日的眼光看來，却又使人覺得他未免帶着狹隘的愛國主義思想耳。

公度在英倫一年，遍遊英法各地，復東歸，出任我國駐新嘉坡第一任總領事，以替代原有之駐新嘉坡領事左秉隆。港大教授羅香林近曾將其所藏黃公度於離英來新前致老友胡曉岑書三紙、詩一紙及山歌二頁抄示，其書末云：

「遵憲奔馳四海，忽忽十餘年，經濟勛名一無成就，即學問之道亦如鷁退飛，惟結習未忘，時一擁鼻，尙不至一行作吏此事遂廢，刪存詩稿二三百篇，今寄上『奉懷』詩一首，又山歌十數首，如兄意謂可，即乞鈔一通，改正評點而擲還之。弟於十月可到新嘉坡，寄書較易也。」

下署八月五日。從這一封信看來，我們可知公度到新履任，當在一八九一年（光緒十七年）十月。

公度到任一月，詳察各島情形，以及僑民疾苦，上書薛公使請求設法改善。復提倡學術，創圖南社，按月課題，獎勵學人，一時文風丕振。公度有「新嘉坡雜詩」十二首，茲錄其中四首於後：

「天到珠崖盡，波濤勢欲奔，地猶中國海，人喚九邊門，南北天難限，東西帝并尊，萬山排戟險，嗟爾故雄藩。」

「絕好留連地，留連味細嘗，側身饒荔子，偕老祝檳榔，紅熟桃花飯，黃封椰酒漿，都縵都典盡，三日口留香。」

「舍影搖紅豆，牆陰覆綠蕉，問山名漆樹，計斛蓄胡椒，黃熟尋香木，青曾探錫苗，豪農衣短後，遍野築團焦。」

「會飲黃龍去，馱經白馬來，國旗颺萬舩，海市幻重台，寶藏諸天集，關門四扇開，紅鬚定何物，驕子復雄才。」（「入境廬詩草」卷七第三至五頁。）

「三日口留香」句下有「自註」云：「留連，果最美者。諺云：『典都縵，買留連；留連紅，衣箱空。』」案「都縵」即「沙籠」，是馬來人和娘惹所樂穿的一種衣裳。

紅豆在中國甚罕見。可是在南洋，却俯拾即是，因為生得太多了，自無人愛惜，只有小孩子把它穿成一串一串的瓔珞，拿來玩玩罷了。新嘉坡產胡椒不豐，多有印尼買

進，再轉銷歐美，但現在已失其轉口的地位了。至於馬來亞的錫產，直到今日，仍居世界第一位。

當時中國領事與英方官吏時常發生齟齬，英廷以爲「中國風氣初開，恐爲領事官者不自知職守，有侵權越分之舉。」（見薛福成日記所引。）而清廷則以爲「英人忌華官號令之故，每事阻撓。」（見「西征紀程」所引。）據陳育崧考證，黃公度與英官華民護衛司芥蒂尤甚，至形於筆墨（見許雲樵編「南洋雜誌」第一卷第七期）。「紅髯定何物，驕子復雄才」，便是對於英官的譏刺。

公度在新嘉坡，尙有一詩章不可不述者，那便是「番客篇」，五古，長二千餘言，如行雲流水，一氣呵成。是詩，也是散文，所謂以散文寫詩，這是他最成功的地方。這詩以「山雞愛舞鏡，海燕貪棲樑，衆鳥各自飛，無處無鴛鴦，今日大富人，新賦新婚行」始，繼叙這豪家新婚如何鋪張，以及賓客雜沓的情形，中間來了一個蒜頭叟，和公度傾談，「指問座上客，脚色俱能詳。上頭白衣人，漁海業打漿，大風吹南來，布帆幸無恙。初操牛頭船，傍岸走近港；今有數十輪，大海恣來往。」又說，「右座團團面，實具富者相，初來錐也無，此地甫草創，海旁占一席，露處關榛莽，蜃氣壚樓台，漸次鏤疊嶂，黃金准土價，今竟成閭巷。」蓋叙述我們的祖先冒險橫海南來，胼手胝足，筆

路盤纏，以啓山林，歷盡千辛萬苦，始得成立家業。可說是寫實主義的作品。最後，他有感於「近來出洋衆，更如水赴壑，南洋數十島，到處便插腳」，以爲僑民既多，「番地應設學」，僑教是不可不提倡的。

公度在新嘉坡，意頗不適，第二年元旦，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有句云：「南斗在北海初流，春非我春秋非秋！」可想見他當時的心情。

不久，公度染上了瘧疾，寓章園養病，有詩云：

「海色蒼茫夜氣微，一痕涼月入柴扉，獨行對影時言笑，排日量腰較瘦肥，平地風波聽受慣，頻年哀樂事心違，笠簾叢缺桃榔杖，何日東坡遂北歸。」（「人境廬詩草」卷七第七頁。）

我們讀了這一首詩，可知公度當時一定聽到了不少奸小對於他的譖言，又加體弱多病，大有「鳥倦飛而思還」之意了。

公度病瘧經年，醫生勸他出遊，遂往檳榔嶼、麻六甲、北臘等處，假居華人山莊，所見多奇景，每隨意成吟，未嘗錄艸。病起追憶，得「養病雜詩」數十首，茲錄其中數首於後：

「萬山山頂樹參天，樹梢遙飛百道泉，誰信原頭最高處，我方跂脚枕書眠。」

「月黑風高樹影沉，鳥鳴蟲息夜愔愔，柴門似有誰搖撼，曉起縱橫虎跡深。

「高高山月一輪秋，夜半椰陰滿夜樓，分付馴猿攀摘去，渴茶渴酒正枯喉。

「桃花紅雜柳花飛，水軟波柔碧四圍，五尺短繩孤掉艇，小兒驢曳鱸魚歸。」

（「入境廬詩草」卷七第十二至十三頁。）

當時馬來亞山柳景象，可以概見。

一八九四年，張之洞接兩江總督任，電召公度返國，主持江寧洋務局。公度的南遊生活，也就告終了。

一九五四年九月一日記者節於新嘉坡。

後記

本文成後，得歐陽純兄介紹，晤公度的侄兒黃伯權先生。伯權先生已有七十高齡了。我以「入境廬詩草」一九三一年上海印本黃能立君「校刊後記」中曾說公度尚有遺著文集若干事相告，并問他是否能知其事。伯權先生說他有一個堂弟叫仲雍的，曾跟公度至新嘉坡；公度患肺炎在嘉應家中易簣的時候，仲雍亦隨侍在側。公度遂將其遺著一大箱，囑咐仲雍保存。那些遺著，他是看過的，各種文體都有，只是沒有整理成帙。

近世客族中出了兩位偉人，其一是太平天國的革命領袖洪秀全，其一便是我們的愛

國大詩人黃公度。從以舊文學寫新思想這一點來說，公度實在是開風氣之先。所以標點、箋註和翻印公度的作品，整理、出版公度的遺著，研究公度的思想與見識，實在是今日中國應做的文化研究事業之一。仲雍現居祖國，公度的遺著當尙保存如昔，希望國中有人奮臂而起，做些應做的文化事業，那時候再也無需像我這種外行人來置喙了。

九月九日，子瑜又識。

（發表新嘉坡中國學會一九五四年年刊）



五 文學得攙緊科學的手

「文學得攙緊科學的手！」這意見並不新鮮，十餘年前，顧均正先生就曾提倡過了。可惜沒有人響應。

科學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分別。文學得抓緊社會科學的手，這是已經不在話下了；本文所要討論的，單是：文學得抓緊自然科學的手。記得曹伯韓先生說過：「文學和科學不同的地方，並不是文學是感情而科學是理智的。沒有通過理智的感情是混沌的。」郭鼎堂先生也曾說過：「我們生在這科學的時代，誰可以不懂科學？」弄文學的自然也不能例外。

從前有些文人，每喜談狐說怪，欺騙讀者：一部「幼學瓊林」，簡直是集迷信之大成（後人補作的便較有科學根據了）；而神仙劍俠的電影和連環圖畫，更不知誤了多少人家子弟！我們祖傳的非科學的東方思想，使人很糊塗；我們要不糊塗，便不可不懂科學。

其實，我們先前，早已經有一些懂得科學的哲學家、文學家了。只可惜的是：我們

一些不長進的後輩，不能把他發揚光大，即偏要拿他們的一些玄妙的道理，嘩啦一通。譬如那反文明的莊周，大家知道他曾經很激烈的主張過什麼「絕聖棄知」啦，「摺斗折衡」啦，可是，在他的一部「莊子」裏面，我們也可以找到很合乎科學原理的話：

「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

這不就是今日數學上所謂「無窮級數」的定理嗎？唐朝李華的「弔古戰場文」，雖然也有過很迷信的「……往往鬼哭，天陰即聞」的句子；但在同一文裏，我們却可以看到很合乎科學的事實的話：

「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

宋朝的蘇洵，在他的「辨奸論」裏也有過：

「月暈而風，礎潤而雨」

的話，都是有他的科學根據的。

近人王國維先生，在他那傳世之作的「人間詞話」裏，引稼軒中秋飲酒達旦，用「天問」體作「木蘭花慢」以送月的詞：

「可憐今夜月，向何處，去悠悠？是別有人間，那邊才見，光景東頭。」

說是「詞人想像，直悟月輪繞地之理，與科學家密合」。

稼軒卽辛棄疾，是南宋時的大詞家，生於一一四〇年，死於一二〇七年。淺學如我，到現在還不知道衛星之說傳至中國究竟起於何時；但我們的辛稼軒，却遠在七八百年前，已知道月球繞地運行的道理了。

地圓之說，也不知道究竟起自何時，大約當時確立於十五世紀葡萄牙航海家麥哲倫環繞地球而航行一週之後。但在中國，自從我們那所謂「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寫下了「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見「祭十二郎文」）的名句之後，到現在已經有一千多年了，「天涯地角」，還是不斷的有人在使用它，也不問與地圓之說是否相脗合。我們對於這一類的詞句，却不能呆看。譬如「天涯地角」，只能作兩地相隔的遙遠解，不是真的有什麼天邊和地角的。又譬如李白的詩句，說什麼「白髮三千丈」啦，什麼「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啦，我們也不要去相信他白髮真的有三千丈那麼長，頭髮早晨如青絲一樣，黃昏時便白得像雪那樣的了；前者不過是形容髮白而長，後者不過是形容髮白的快。而實際上，白髮不論怎樣長也決不會長到三千丈；頭髮由黑變白，是需要經過長久歲月的漸變，絕不會在一朝一夕之內猝變而成的。更譬如岳飛的「滿江紅」詞，起句便是「怒髮衝冠」，也是誇大的形容，我們至多祇能作怒氣之盛，至於髮指看，而事實上，不管怎樣的「怒髮」，也決不會「衝冠」的。

韓愈的文字，儘管常常有不合科學的，但他對於死後的有知？無知？却總是存着個疑問：「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也，無窮期矣。」（見「祭十二郎文」。）到了清代的袁枚，仿「祭十二郎文」作「祭妹文」，更直說「死後之有知無知，與得見不得見，又卒難明也。」這在近代人的眼光看來，是已經不成爲問題了。所謂「鬼」，更是無稽。記得魯迅先生在紹興中學教書的時候，便有過一段皮鞋踢鬼的故事：

他的家和學校的距離頗遠，中間有一條近路，是經過義塚堆的。有一天晚上，在學堂裏弄得時間遲了，回家時，心想走那一條路好呢。決定仍走近路。兩邊草長得很高，忽地望見正面有個白東西毫不做聲地停住着，而且漸漸變爲矮小，終於成爲石頭那樣不動了。他當時有些躊躇，這樣深夜，會有人在這樣地方行動，大約是所謂「鬼」吧？對於這惡物的襲來，是「進攻」呢還是「退却」呢？短時間的決定：還是衝上去，而且走到白東西的旁邊，便用硬底皮鞋先踢了出去，結果那白東西呵啞一聲，站起來向草中逃去了……他後來講到這趣事時，笑着說：「鬼也是怕踢的，踢他一脚，就立刻變成人了。」（見許壽裳著「亡友魯迅印象記」。）

可見所謂「鬼」，不過是人假裝的。

成因：

許地山先生在他的「扶乩迷信研究」一書裏，更用科學的方法，解釋所謂「鬼」的

「常人每在幽暗的地方，或夜裏見鬼。除掉幻覺錯覺以外，一部份可以用後象作用來解釋。在瓜棚底下，燈光如豆，疲乏的農人於日間工作之後坐在那裏談話。其中一人忽然見鬼影從遠而來，或向他方逃去。這是見鬼的故事的一個典型。稍微懂得心理學、或生理學底便知視覺有後象作用。後象所現的色彩與實物爲相反的比色。如實物是暗色，後象便是白的，實物是紅的，後象便是綠的，實物是黃的，後象便是藍的……餘類推。在瓜棚下自以爲見鬼的人或看着對談的人太久了，後象作用強起來，忽然望外一瞥，他眼裏的後象便落在所望的地方，隨着他的眼睛的移動，就像有人影在移動着。他心裏本有一種鬼的觀念，一看到這裏，當然是斷定見了鬼。」（八十八頁。）

這「後象作用」，我們可從看電影時得到證明：往往第一幕的人物已經映過去了，第二幕的人物早已映了出來，可是銀幕上分明還有第一幕的影子殘留下來。這便是對第一幕看得太久了，後象作用強了起來，再看到第二幕的影子時，便將眼裏的第一幕的後象落在所望的第二幕的影子的地方。可是一會兒那所殘留的第一幕的影子便消逝了。

我們弄文學的人，消極來說，最少應該擯棄一切非科學的迷信的詞語；積極來說，更應該多多創造些合乎科學的詞語，有系統地把所理解的人生問題表現出來。

一九五一，四，三，夜，古晉。



六 文學與科學的攜手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二日在馬來亞廣播電台「學術講座」的廣播詞——

記得在四年前，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主張「文學得攙緊科學的手」，後來收入在「翦春集」裏。現在還要來談談這個道理。

文學，古今的界說不同：古人所謂文學，是指「文章博學」而說的；墨子「非命」篇，以爲凡所發出的言談，都是文學的道理。這樣看來，連哲學、史學……等等也都可以算是文學了。至於今人之所謂文學，乃是專指表達作者的情意、以反映社會生活、使讀者起了同情或共感的語言文字而說的。前者可以說是廣義的文學，後者可以說是狹義的文學。不論是廣義的文學也好，狹義的文學也好，都得和科學携携手。

有人說，「凡是科學底的人們，因爲精細地鑽研着一點有限的視野，便決不能和博大的文人的感得全人間世的精神相通。」這話很有道理。因爲文學創作常常是作者的精神的熾烈的擴大，常常要靠着想像力，又常常是有意的表現而誇張，所以我們不能強求每一個科學底的人，都要懂得文學。可是，我們却希望每一個弄文學的人，都得設法去

拉緊科學的手；否則，鬼話連篇，對讀者是不能不負責任的。

「其實，我們先前，早已經有一些懂得科學的哲學家、文學家了。只可惜的是：我們一些不長進的後輩，不能把他發揚光大，却偏要斷章取義地拿他們的一些玄妙的道理，來嘩啦一通。」（見「翦春集」。）在那「文學得攪緊科學的手」一文裏，我曾經歷舉了中國古代一些哲學家 and 文學家的作品之有科學思想的，現在再舉一些例子來談談：大家都知道，地圓之說，是確立於十五世紀葡萄牙航海家麥哲倫環繞地球而航行一周以後；但却少有人知道，二千餘年前的戰國時代的墨子，早已經有地圓的假說了。請看墨子的「天志」篇：

「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度天下之圓與不圓也？曰：中吾規者謂之圓，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圓。是以圓與不圓，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圓法明矣。」

這不特是地圓的假說，而且在物理學上幾何學上也有創見。所以，我說：墨子的思想中，有不少進步的、科學的。

在這二十世紀的六十年代，還有人迷信鬼神。可是，孟子早就告訴我們：

「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

東漢時代的王充，對於鬼的有無，說得尤其透澈：

「世謂人死爲鬼，有知，能害人；試以物類驗之，人死不爲鬼，無知，不能害人。何以驗之？驗之以物。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爲鬼，人死何故獨能爲鬼？……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能爲精氣者，血脈也，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爲鬼？」（見「論衡」「論死」篇。）

其時佛教自西域傳入中國，後來信奉的人漸多，到了齊梁間，更是風靡全國。信佛的人，都以爲人死而神不能滅；只有范縝反對這種說法，作「神滅論」來責難他們。而梁武帝、曹思文、蕭琛、沈約……等，却作了「難滅神論」來反駁他；一時附和的人很多。神滅一事，成爲當時思想界所熱中討論的問題。那時是梁代，對於那一批「難」「神滅論」的人，已有人笑他們的迂濶；想不到在一千多年後的今天，還有人相信人死可以再生，所以阿Q被押去槍斃的時候，也忘不了「過了二十年又是一個」的那句名言。

雖然，古代文人的作品，有進步的、科學的一面；但也有迷信邪說的、糊塗的一面。這是因爲古時科學知識不足，對於自然界變化多端的現象，不能用科學的原理去說明它，爲了省事，便作種種的假設，歸之於神的力量。而古代的一些帝王，又往往假借神權以統治人民；一些封建時代的文人，爲了討好帝王，更往往造作故事，以明帝王之

受命於天，莫得拂逆——如唐杜光庭的「虬髯客傳」，便是借着俠士虬髯客，尙且知道敬避太宗，以見太宗是天降的真主，而勸那些想起兵造反的藩鎮臣民，不要和「真命天子」來爭衡。他說：「真人之興也，非英雄所冀，況非英雄乎？」那用意是不難洞察明白的。

我們對於這一類的作品，只能當作神話故事或是寓言閱讀，不可一味相信它。這樣，我們讀古人書，才不會被古人帶着走。

文學是反映社會生活的，所以，除了應該拉緊自然科學的手之外，更應該攬緊社會科學的手：這是盡人皆知的道理，不必再加論列。「假使藝術（文學）創作者主觀上反對藝術的功利主義，而努力製作他的唯美的藝術品：這件事實本身也就是藝術反映社會生活的憑據。」（曹伯韓「藝術的產生和發展」。）因為這已反映出那個時代的社會生活使藝術（文學）與現實脫離關係了。

七 文學作品的「比喻」

文學作品之有比喻，由來已久，中國現存可信的最早的詩文「詩經」，已有「比」「興」的妙用；所謂詩的六義，三曰「比」，四曰「興」，是。唐朝的孔穎達，對於比興的意義，曾下了注解說：「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又說：「其實美刺俱有比興。」可見無論讚美或諷刺，都得善用比喻。

就是後來屈原的「離騷」，雖是憤憤然的不平之鳴了，但也多有善用比喻的地方。「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便是以芳草喻明智之士，以蕭艾喻佞狂惑不顧的人。

漢以後的文學作品，比喻的技巧，更是曲盡其妙。我們常聽得人家說，「毛遂自薦」！這毛遂自薦的故事，便是見於漢司馬遷「史記」的「平原君傳」：

「毛遂自薦於平原君，君曰：『士處世，如錐處囊中，其末立見。先生處門下三年，未有聞焉。』遂曰：『使臣得處囊中，將穎脫而出，豈特末見而已

哉？」

平原君以「錐處囊中」，比諸士之處世，以「其末立見」喻鋒鏑易露，真是確到好處。言外之意，是說毛遂大概沒有什麼本領，所以「未有所聞」。

唐柳宗元的「郭橐駝傳」，便是借着種樹的不合生理，來諷喻做官的治民之不得其法。宋蘇軾有「日喻增吳彥律」云：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叩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

這是諷喻那末嘗目覩，妄加臆測的錯誤和可笑！

現代作家魯迅，善用比喻，真是前無古人。卽如同是對於那些未嘗目覩，妄自以爲知者的譏刺，那所引的例喻也已高明和確切得多了：

相傳有兩個「近視」的，彼此都不肯承認自己的眼力不好。有一次，他們聽說某家的門楣上將掛一個匾，於是二人事先都暗自走去問那製匾的匠者；甲粗心，只問明那匾上鐫的四個大字，乙細心，詢知左旁還有一行小字，說是某年某月某日立。後來二人相牽到某家的門前，去看那匾上的字，甲說只有四個大字，乙說旁邊還有一行小字，甲

不服信，請教他人的結果，是匾還沒有掛出來。（大意。見「魯迅雜感集」「匾」所引「笑林廣記」的故事。）

我國文學作品的比喻之技巧，已舉隅如上。不過上述各例，都是屬於人事的。現在再就人形及動作等等的比喻，加以引伸。

描寫如果不用比喻，有些地方，將要無從形容起。例如要描寫臉孔的顏色或形狀，要是不用比喻來形容，祇是「生得面圓，耳大，鼻直，口方」（見「水滸」第二回），或是「臉色青白」，或是「這個人的臉色半黃半紅」，讀者總覺沒有明確的印象。但若用比喻，如「鵬蛋臉」、「瓜子臉」、「蘋果臉」，或「鯉魚嘴」、「櫻桃嘴」，或「一臉疙瘩，彷彿風乾福橘皮似的」，「那雙眼睛，如秋水，如寒星，如寶珠，如白水銀裏頭養着兩丸黑水銀」，（後二引見「老殘遊記」第二回）或「麻臉兒，如滿天星」等，可就傳神極了。

又如描寫身分，若用確實的數詞量詞來記載，「身長八尺，腰大十圍」，「體重三百五十斤」，或「體輕祇三十七斤五兩四錢」，科學底固科學底矣，但試問作者事實上可能不可能拿尺到各種的人物上面去量，拿秤把各種的人物來衡呢？即使可能的話，單是記下呆板的數目字，也覺得味同嚼蠟。不如「體胖如豬」，「瘦長如竹」，或「近來

一病輕如燕，扶上金鞍馬不知」（見「蘇曼殊全集」中所引），來得生動多多。

又如描寫靜坐，「他呆坐着，一動不動」，遠遜於「老子毫無動靜地坐着，好像一段呆木頭」（見魯迅「出關」）；描寫快跑，「很快的跑過去」，未若「飛也似的跑過去」，也都因為前者不用比喻而後者却用比喻的緣故。

此外如寫情、寫景，也都以能多用比喻為勝。諸君如想使你的寫作能刺激讀者，不致平淡無味，那麼便請充實可以比喻的材料。常言道：「某情某狀，真非筆墨所能形容」；實則并非不能形容，而是缺少適當的比喻材料，所以無從形容起罷了。比喻第一要適宜，第二要生動，第三要普遍（通俗），否則便會弄巧反拙，不可不注意。

八 「說與旁人渾不解」

當劉季孫不知給啥事驚醒他的閒夢——其實，他醒來已經聽到了樑間的燕子在呢喃呢喃地叫着——的時候，因為渾渾然，渾渾然的幾乎——甚至於「甚至」不能領會其意，於是，他就咿唔地吟成了一首絕詩，詩中有了這麼一句：「說與旁人渾不解」。

燕子呢喃，本來是人所不容易領會的，何況他是一個安逸自得的人，是一個浪漫主義者；更何況他是剛剛由閒夢裏驚醒過來的。

由這喻例引申到文章裏的文字問題，應該很有趣。

因了魯迅先生的介紹，得以看到一篇鶴見祐輔的「讀的文章和聽的文章」的譯文：

「有一天，亞那託爾法蘭斯和朋友們靜靜地談天：

「批評家時常說，摩理埃爾（Jean-B. Molière）的文章是不好的。這是看法的不同。摩理埃爾所指意的處所，不是用眼看的文章而是用耳朵來聽的文章。為戲曲作家的他，與其訴於讀者的眼，是倒不如訴於來看戲的看客的耳朵的。看客是大意的。要使無論怎樣大意的看客也聽到，他便反覆地說；要使無論怎樣怠慢的看客也懂得，他便做得

平易。……」

如此這般的見解，却不由我們不異議了。文章所以好的處所，從形式（文字）說，是在乎「明白易懂」，則在乎他——作者所「措施的處所」，可以「用耳朵來聽的」。但，同時，也仍然可以「用眼看的」。可以「用耳朵來聽的」而不可以「用眼看的」的文章，恐怕「未之有也」。的確，「爲戲曲作家的他，與其訴於讀者的眼，是不如訴於來看戲的看客的耳朵的」。但這「不如」是很難得地不如的。至於文章能做到「無論怎樣大意的看客也聽到」，「無論怎樣怠慢的看客也懂得」，在形式上已經算是成功了，反覆與不反覆，又有什麼關係？「平易」嗎，正是現在所需要提倡的所謂「大衆化」。我們不知道這裏所謂「批評家」也者，是不是法蘭斯自己理想出來的。老實說，我不敢相信普天下之竟有這種「不知所云」的批評家。

然而，作者引出了這一段的故事之後，却又發表了他的偏見說：

「文章和演說的不同，就在這裏。」

接着，他又發了一大堆的囁嚅，最後結論道：

「所以，所謂文章家和所謂雄辯家，是否一個人可以兼做的呢，倒很是疑問。……」文字是代表語言的工具，故文、言應該是合一的，而他竟替它們分起家來。雖然事

實至今文、言尙是分家，但，這是畸形的現象，我們總不可不相信它們是有合而爲一的可能的。所以，「所謂文章家和雄辯家，是否一個人可以兼做的呢」，這倒不是「疑問」而是「愚問」的了。巴爾扎克所以爲人嘆服的原因，就在他的「用會話來描寫人物的巧妙，把所描寫的人物的會話寫得活潑潑地好像耳聞一般的手段，以及那對話的完全。」（見許遐文。）

世間有許多「說與旁人渾不解」的人，有的是根本不善說話，有的是故弄玄虛。假若我的話沒有什麼不對的話，則法蘭斯所謂的「批評家」和鶴見祐輔，他們都像燕子呢喃呢喃地語着罷了。

九 「聊齋志異」的成因及其評價

「聊齋志異」是近二百年來我國社會競相傳誦的一部名著；聽說在英國、德國和蘇聯，都有它的譯本，且有據其故事編爲戲劇的。

近日因爲搬家，無意中發現舊時的剪貼簿，有如下的一則：

「據伯力塔斯社訊：中國大文豪蒲松齡之「聊齋志異」原稿共十六卷，現存蘇聯科學研究院遠東圖書館云。」（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天津「益世報」。）

此消息頗有疑問。我手邊有二十年前在漢口出版的「西北風」半月刊合訂本，內載史天行一文，說他於一九三〇年長遼寧省西豐縣教局時，曾識「聊齋志異」作者蒲松齡的八世孫步瀛，親眼看過他存有「聊齋志異」的原稿，并聽得步瀛說：

「此稿原共四函，每函四厚冊。昔年予祖父在遼，有同寅某君，愛此稿本，迭次借閱，其後，第三函竟未送還；迨傳至予手，恐復發生此事，故非不得已，不敢取獻。數年前，商務印書館知予有此稿本，曾與予接洽，擬以珂羅版翻印，由予抽版稅。予以先人手澤，慮被毀損，故年來雖窮，亦不願以此易食云。」

塔斯社謂原稿十六卷，自然是指完璧的而說，恐未必是蒲氏家中所藏的。商務印書館以珂羅版翻印是書相商，尙且未能得到蒲氏八世孫的允諾，所以敢斷定他絕無將其「先人手澤」賣出之理！史天行君訪蒲松齡八世孫步瀛，時在一九三〇年，而塔斯社電訊，係發於一九三四年；先後僅四年時間，即使步瀛因困窮而迫得將「先人手澤」出賣，亦只有第一、第二、第四三函而已，那著在「同寅某君」手中的第三函，又何以竟能同時爲蘇聯科學研究院遠東圖書館所得？這是一件很使人費解的事。

「聊齋志異」全書，世所傳本十六卷，共四百三十一篇。戰前成都華西大學教授劉君藜仙，藏有寫本的「聊齋志異」，與世所傳本頗有差異，且多出未刊稿十八篇，其中一至六篇在「人間世」刊出，餘者在「西北風」刊出，名爲「聊齋志異佚稿」；可是文字蹇澀，恐係後人僞作，亦未可知。

在塔斯社的電訊傳出之後不久，有一個叫做劉丁辰的，特地走到了蒲家莊去訪問蒲氏的八世孫步瀛，并寫了一篇訪問記，在報上刊了出來。據步瀛說：

「當年八世祖本係一介寒士，生於明崇禎十三年，沒於清康熙五十四年，享年七十六歲。因爲屢試不第，隨即放棄功名，設教於同邑畢尙書家。尙書在江南宦遊多年，素有藏書之癖，晚年解印返里，有藏書五庫，滿載而歸。先世祖設教於尙

書家幾近十年，得以博覽羣書。畢尙書的老太太晚年身罹慘疾，終日鬱鬱不樂，常遣人請先世祖爲之說故事，以資解憂。久之，先世祖將此許多故事筆之於書，卽成爲『聊齋志異』的原稿。其中當然未免有些是虛構的，可是大半故事，實得自他人的傳說；當日八世祖曾與清初名士王漁洋結一詩社，每次集會，約定以交換見聞趣事爲樂，藉此得了許多材料，寫成好些東西。」

這一段的記述很有價值，因爲它告訴我們『聊齋志異』的成因：一是爲畢尙書的老母說故事，而不得不編撰；一是與王漁洋結詩社，從社友交換的見聞趣事中，得了不少的材料。王漁洋是有清的一代詩宗，生平風節，多有可傳的。

涉及『聊齋志異』的成因的，尙有易宗夔的『新世說』，那裏面說：

「蒲留仙居鄉里，落拓無偶，性尤怪誕，爲村中童子師以自給，不求於人。其作『聊齋志異』時，每晨携一大盞，中貯茗茗，又具淡巴菰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陳蘆蓆，坐於上，見行者過，必強執以語，搜奇說異，隨人所知，渴則飲以茗，或奉以煙，必令暢談乃已。偶聞之事，歸而潤飾之，如是二十餘年，書方告成，故筆法超絕。」

以煙茗置大道旁，求行人爲之談奇說異，這固可見出蒲氏的苦心孤詣；但若僅是這

樣而成書，恐將毫無價值之可言。蒲松齡原是山東淄川人，字留仙，一字劍臣，號柳泉居士。他的身世坎坷，對於當時官場腐敗的情形，以及民間的疾苦，也知道得頗為深切。所以在其「聊齋志異」中，不難找出一些暴露官場黑暗的故事。如「促織」一篇，寫「宣德間，宮中尙促織之戲，歲征民間。此物本非西產，有華陰令欲媚上官，以一頭進；試使鬥，而才，因責常供。令以責之里胥……」云云，暴露出下級官吏爲着討好上官，而不顧人民的死活，這是有它一定的社會價值的。但可惜他對於高級的統治者——清朝的中央長官之只顧自己享樂，而不顧民間疾苦一點，却不置批評，這是因爲他對於高級統治者還存着一種幻想；而在蒲氏的其他詩文中，有時甚至還要加以歌頌。所以我們對於蒲松齡和它的「聊齋志異」，是不能給予過高的評價的。

一九五五年二月廿七日於星洲。

一〇「史記」的語病

——一九五五年九月六日在馬來亞廣播電台「學術講座」內廣播詞——

古書語病最多的，要算「史記」。「史記」一書，無疑的是我國紀傳史的開山老祖，在史學上有其崇高的價值。但自班固以來，評史遷的（班固的「漢書」有「司馬遷傳」），都說他不獨是我國的一個大史家，而且是一個大文學作家；他的著作，為歷代古文家所推許，崇為最高的典籍——甚至向來編文學史的人，都異口同聲地說他是「開後世散文文學大源的第一人」，這就要大打折扣了。

「史記」全書一百三十篇，共有五十二萬多字，幾乎沒有一篇沒有語病；若不是作者的人格高尚，所記述的史事又值得後人參攷，要想單靠他的不甚高明的文字而流傳，是不可能的。

金代王若虛所作的「滹南遺老集」，其中有一篇叫做「史記辨惑」的，曾指出「史記」好幾個地方的語病。如「李廣傳」說：

「李廣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終不

能復入石矣。」

王氏以爲這裏多用了兩三個石字，替它改正如下：

「李廣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沒鏃；既知其石，因復更射，終不能入。」
實在通順得多了。如果改作「李廣嘗見草中有虎，射之，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終不能入。」也可以。又同傳說：

「廣自剄，軍士大夫一軍皆哭。」

王氏以爲「軍士大夫」而又「一軍」，難免有「疊床架屋」之譏，這指摘亦很對勁。
「漳南遺老集」另有「文辨」一篇，指出「史記」「屈原傳」中的一個語病，那原文是這樣的：

「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

這裏的「曰」字與「以爲」二字，意義是重複的。如果留下「曰」字，便不必再加「以爲」；如果留下「以爲」，便不必再加「曰」字。

提起了「屈原傳」，那語病還多着呢！以下是我找出來的有語病的原文：

「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

「戰」與「擊」意義又重複了。改正的方法是留「戰」棄「擊」，或是留「擊」棄

「戰」，都可以。還有：

「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

前面的「如楚」二字可以省去，因為下文尚有「如楚」二字，以表示實踐，所以不必先提「如楚」，讀者也可以知道他（張儀）所請往的目的地一定是楚國無疑；而且「往」字與「如」字意義重複（此處「如」字亦作往解），連用起來，實在拖累得很！還有：

「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

這真是錯得可以！因為「忠臣」只是一個詞兒，並不是兩個相對稱的詞兒，又怎樣能分呢？如說「黑色之分」、「高處之分」、「美麗之分」、「前面之分」，都不通；而「黑白之分」、「高低之分」、「美醜之分」、「前後之分」，便都通了。所以「忠臣之分」應改做「忠奸之分」。還有：

「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

應改做「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而將「澤畔」二字畧去，因為「澤畔」與「江濱」，意義相重，既然「至於江濱」，當然是在「澤畔」，何必「江濱」而又「澤

畔」呢？

「田單傳」說：

「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叛）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

上一句的主詞並不就是「田單」，所以「兵日益多」之上，應該重加「田單」二字。又「乘勝」二字之下，照文勢要述田單軍的行動，「燕日敗亡」四字是萬萬接不下去的。如果去掉「燕日敗亡」四字，而將「卒至河上」改為「追至河上」，便沒有語病了。

「信陵君傳」說：

「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

「父子俱在軍中」、「兄弟俱在軍中」、「獨子無兄弟」等語之下，都應該加上一個「者」字，才合語法。

又「孟子荀卿列傳」說：

「……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

胡適之以爲「齊襄王時」四字應屬上讀，因爲這四字在文法上是一個「狀時的

讀」，狀時的讀與所狀的本句決不可用「而」字隔開，隔開便不通了。照他的說法，「齊襄王時」與「爲老師」便沒有關連了。其實，「史記」一書，類似這樣不通的句子還是所在多有；陳登元所作的「荀子傳畧」（見「國學季刊」第二卷第一期），便曾經指出「孔子世家」中的兩個例子：

一、「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

二、「魯昭公之二十二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

胡適之似乎以爲「史記」的文字都是通的，若果有不通的地方，便是後人句讀的錯誤，這未免太迷信古人了。

宋代的蘇轍，因爲不滿「史記」的繁蕪，別撰了「古史」一書，可是他的刪改處反而比原書更不通。如「史記」「甘茂傳」原文：

「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

「古史」却省去了「事」字，這樣一來，學百家之說的是史舉，而不是甘茂了。同朝黃震所作的「黃氏日鈔」，曾指出他省字的不妥善。這種越改越糟的「古史」，自然是更無足取了。

一 「魯迅詩話」再版後記

「魯迅詩話」一書，於今年七月一日出版，兩月內便告售罄。大公書局經理來信通知，並商議再版的事宜，實在出於我的意想之外。

「魯迅詩話」出版之後，曾接到國內外許多讀者的來信。有一位讀者，說是自魯迅先生逝世的十六年來，中國文壇，對於魯迅先生的詩及其詩話，從未置褒貶，有的，便從「魯迅詩話」始。這也許是事實。批評家們大概以為魯迅先生對於詩這方面的成就並不太大吧，所以多不屑多費口舌。其實，魯迅先生對於詩的造詣之深，正如我在初版的序文中所說：「當不是一些稱為詩人者所能幾及的。」

不過，對於魯迅先生的詩，偶一提及的人是有的。現任清華大學教授的王瑤先生，在他所著「魯迅與中國文學」一書中，對於魯迅先生作詩的動機，便曾有過極其正確的說明：「他做詩是爲了向舊文學示威，鞏固新文學的地位的。」（見該書第六十六頁。）

那麼，他的作舊詩呢，這大概是受傳統文學的影響太深了的緣故。他的集子，就會引過「離騷」的句子刊在書首。早在一九一四年所作的「藝文雜話」（原載紹興「越鐸

日報」副刊），也曾仿「離騷」的體裁譯過德意志詩人赫納的兩首詩：

余淚汎瀾兮繁花，余聲悽疊兮鶯歌。使君心其愛余，余將捧繁花而獻之。流鶯鳴其嚶嚶兮，傍吾歡之眾恩。

眸子青地丁，輔頰紅薔薇，百合皎潔兮君柔荑，吁嗟芳馨兮故如昨。奈君心兮早搖落。（見唐弢編「魯迅全集補遺」第六頁。）

同年，先生曾以巴人的筆名，在同報發表「百草書屋簡記」一文，極口讚譽前清布衣山陰童二樹先生的「采蓮曲」，說是「古節古音，雖置諸晚唐人集中不辨焉。」（見同書第七頁。）

魯迅先生自說他開始寫文章的時候，因為受章炳麟先生的影響很深，頗有好古的癖性，所以常喜用些古怪的字，以為愈古愈足以顯見自己的高明。你看他稱賞童二樹詩，便是因為它「古」的緣故。

可是，後來魯迅先生知道要振興中國，老調子早就該唱完了，所以他一轉而攻擊舊文學，成為新文學陣營裏的一個最勇敢最切實的戰士。他不但始創新小說，而且也為寂寞的詩壇寫過新詩。這裏還有「他」一首，是本書初版時未經採入的：

「知了」不要叫了，

他在房中睡着；

「知了」叫了，刻刻心頭記着。

太陽去了，「知了」住了，——還沒有見他，
待打門叫他——銹鐵鏈子繫着。

二

秋風起了，

快吹開那家窗幕。

開了窗幕，會見他的雙鬢。

窗幕開了，——一望全是粉牆，
白吹下許多枯葉。

三

大雪下了，掃出路尋他；

這路連到山上，山上都是松柏，
他是花一般，這裏如何住得！



不如回去尋他，——阿，回來還是我家。

這詩作於一九一九年，發表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四期上，署名唐俟。我是從「全集補遺」（第十至十一頁）抄錄過來的。當我動筆寫本書的時候，唐弢先生編的「全集補遺」也許還未出版，也許已經出版，可是我還沒有機緣讀到；後來看到了，又因書稿壓積已久，急於出版，也懶得去增補了。這兒就「全集補遺」及其他新見的評著中，有關於魯迅先生的詩及其詩話的，約畧地介紹一下，以補初版的不足。

唐弢先生在「全集補遺後記」中說：「先生好定盦詩。」是的，先生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的「申報」「自由談」上所發表的「兒時」一文（見「全集補遺」第三二七頁），便是引龔定盦一詩的詩意出發的。龔定盦是晚清的今文經學家，也是當時比較進步的思想家，他的詩文都別具風格，魯迅先生的愛好也並非專指技巧的。（見「魯迅與中國文學」第廿七頁。）

魯迅對於自己所作的舊詩，是並不看重的；他作了一首舊詩，便是對舊詩諷刺了一次。正如張天翼先生的「論阿Q正傳」所說的：「先生把這些舊文句當作諷刺的對象。他用了那些文句，正是譏笑那些文句。……他這麼一用，就特別有一種風趣，並且非

常尖刻。擁護古文的老學究看了，簡直哭笑不得。」（見張天翼等著「論阿Q」第六十三頁。）所以他的舊詩，大都是打油詩。

本書主要的是論列魯迅先生的「詩話」，提及魯迅的舊詩的，只佔卅五篇中的一篇，爲了篇幅的關係，打油詩概不列入置論。出版後，多承各方的朋友們寄給我一些剪報，有的譽本書能使讀者對魯迅先生詩作進一步的認識，有的却頗有指責之辭，說何以某詩的某句竟未見引論。現在順便在這裏作答：因爲那是打油詩，當初編著的時候，似乎太注重在格律方面，所以沒採入。其實，魯迅先生有些打油詩的含意極佳，而且早已膾炙人口，將來如果時會許可，當再細加論列。

有一位讀者來信，說他不能同意我的「先生的舊詩，縱橫似東坡，而謹嚴似少陵」的說法。他以爲若把魯迅先生卓越的思想，比之杜蘇兩家，簡直是對於魯迅先生的一大侮辱。可愛的先生，請不必着急，我比的只是技巧——筆法而已。

魯迅先生的譯詩，尚有「落谷虹兒畫選譯詩」十一首（譯於一九二九年），是本書初版時所未提及的。「畫選小引」云：「從第一到十一圖，都有短短的詩文，也就逐圖譯出，附在各圖前面了。」（見「集外集拾遺」。）可知那是作爲各圖說明的短詩。今錄「紫花地丁」一首於下：

花卉們都外向，

鬧蜚蝶，吸春光，

樂高飛的雲雀的烽火，

春風中跳舞，使小鳥兒歌唱，

還和那裝模做樣的紅蛙兒，

「哈哈春呀」一同譁浪。

×

×

春的野上，

不管這享樂的爭鬥，

獨有紫花地丁悄然低首，

芳容被淚影沈埋。

（「全集補遺」第二一四至二一五）



你看它音節多麼自然，意蘊又多麼深寫！春的原野之上，百花都在春光中狂歡，獨有紫花地丁却向隅而泣，苦樂不均之象，可以臆見。雖是譯詩，又怎知不是「借他人酒

杯，澆自己塊壘」(見「魯迅全集」蔡元培「序」所引)呢！

本書只就魯迅先生的詩及其詩話，作了一番整理、說明和勘補的工夫，給有意研究魯迅先生的詩及其詩論的人，以些少的方便。至於論列的工作，還做得不夠，——對於魯迅先生的詩的可貴的社會意義，和他的詩論在這個時代中的價值，是還有待於我們的探討與發揚的。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三日鄭子瑜識於南洋。

二 魯迅的「秋夜」

——奇難文精讀指導之一——

秋 夜

(一) 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
(二) 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沒有見過這樣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彷彿要離開人間而去，使人們仰面不再看見。但現在却非常之藍，閃閃地映着幾十個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現出微笑，似乎自以爲大有深意，而將繁霜灑在我的園裏的野花草上。

(三) 我不知道那些野花草真叫什麼名字，人們叫他們什麼名字。我記得有一種開過極細小的粉紅花，現在還開着，但是更細小了。她在冷的夜氣中，瑟縮地做夢，夢見春的到來，夢見秋的到來，夢見瘦的詩人將眼淚擦在她最末的葉瓣上，告訴她秋雖然來，冬雖然來，而此後接着還是春，蝴蝶亂飛，蜜蜂都唱起春詞來了。她於是一笑，雖

然顏色凍得紅慘慘地，仍然瑟縮着。

(四) 棗樹，他們簡直落盡了葉子。先前，還有一兩個孩子來打別人打剩的果子，現在是一個也不剩了，連葉子也落盡了。他知道小粉紅花的夢，秋後要有春；他也知道落葉的夢，春後還是秋。他簡直落盡葉子，單剩幹子，然而脫了當初滿樹是果實和葉子時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幾枝還低亞着，護定那些從打棗的竿梢得來的皮傷。而最直最長的幾枝，却已默默地鐵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閃閃地鬼眈眼；直刺着天空中圓滿的月亮，使月亮窘得發白。

(五) 鬼眈眼的天空，越覺得非常之藍，不安了，彷彿想離去人間，避開棗樹，只將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東邊去了。而一無所有的幹子，却仍然默默地鐵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樣地眈着許多盞惑的眼睛。

(六) 哇的一聲，夜遊的惡鳥飛過去了。

(七) 我忽而聽到夜半的笑聲，吃吃地，似乎不願意驚動睡着的人，然而四圍的空氣都應和着笑。夜半，沒有別的人，我即刻聽出這聲音就在我嘴裏，我也即刻被這笑聲所驅逐，回進自己的房。煤油燈的帶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八)後窗的玻璃上丁丁地響，還有許多小飛蟲亂撞。不多久，幾個進來了，許是從窗紙的破孔進來的。他們一進來，又在玻璃的燈罩上撞得丁丁地響。一個從上面撞進去了，他於是遇到火，而且我以為這火是真的。兩三個却休息在燈的紙罩上喘氣。那罩是昨晚新換的罩，雪白的紙，摺出波浪紋的疊痕，一角還畫出一枝猩紅色的梔子。

(九)猩紅的梔子開花時，棗樹又要做小粉紅花的夢，宛轉地彎成弧形了。……我又聽到夜半的笑聲，我趕緊砍斷我的心緒，看那老在白紙上的小青蟲，頭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麥那麼大，遍身的顏色，蒼翠得可愛，可憐。

(十)我打了一個呵欠，點起一支紙煙，噴出煙來，對着燈默默地敬奠這些蒼翠精緻的英雄們。

指導大概

(一)寫作年月、文體、意念線索。

「秋夜」，選自「野草」，作於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是篇抒情的敘述文字。抒情文是專門發揮自己的情感的。敘述文是敘述某種事件的發生及其經過的。本篇是藉敘述某事的發生和經過，而發抒作者自己的感情的，所以說是抒情的敘述文字。又敘述文

性質上原有主觀和客觀的分別。作者自己做主體，而從事敘述，是主觀的敘述文；作者站在第三者的地位，間接敘述，是客觀的敘述文。本篇以主觀的成份居多，大體上又是主觀的敘述文字。

作者藉着敘述何種事件而發抒怎樣的感情呢？簡單的說，是藉着秋夜的景象「抒盡了他對於宇宙悲涼的情懷」（歐陽凡海語，見「魯迅的書」）。

九月十五日已是晚秋時節，夜的景象，是蕭瑟而帶寒意的。文中提到了「凋落的棗樹，枯萎了的花草，避冷就火的小飛蟲，都是那時候實在的景物。作者對着那些景物，把自己感想織進去，就成了這篇文章。」（見夏丏尊、葉聖陶合著的「文心」。）

本篇開首，是以後園爲立足點，寫出了所見的牆外的棗樹，上面的奇怪而高的天空，天空中的星星，以及被繁霜侵襲的園裏的野花草等景物，都離不了「蕭瑟而帶寒意」的這一意念。「景物是外面的經驗，對於景物的感想却是內部的經驗」（見「文心」）。如「奇怪而高」，如「他彷彿要離開人間而去，使人們仰面不再看見」，如「非常之藍」，又如「閃閃地睜着冷眼」等等，便都是對於景物——夜的天空——的感想，是內部的經驗。就寫成文字說，是一至二段。

由於園裏的野花草被繁霜的侵襲，有一種開過極細小的粉紅花，可就更覺萎縮了。

然而作者生怕這樣未免太煞風景，又不甘寂寞，於是賦予小粉紅花做夢，夢見春天來時熙攘和樂的景象（其實也就在譏刺自我陶醉的人們）。就寫成文字說，是第三段。

四五兩段，寫最直最長的幾枝棗樹枝，「却已默默地鐵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使天空現出不安的情態；「直刺着天空中圓滿的月亮」，「使月亮窘得發白」，而至於「暗暗地躲到東邊去了」。也因為不甘寂寞，厭惡那秋夜的鬼蜮淒清的緣故。這裏另有寄意，留待後面再說。

以下穿插一節關於夜遊的惡鳥的叫聲，更表現出秋夜的蕭颯，使作者發着冷笑，即刻「回進自己的房」，「煤油燈的帶子也即刻旋高了一。就寫成文字說，是六至七段。煤油燈的帶既經旋高，避冷就火的小蟲飛來亂撞。有的遇火而犧牲了牠的性命，有的停在紙罩上喘息。因了那紙罩上「畫出一枝猩紅色的梔子」，使作者想像梔子開花，又是春的時節，棗樹又要結實滿枝，「宛轉地彎成弧形了」。想到這裏，不覺發出快慰的微笑。但又「似乎不願意驚動睡着的人」，所以「趕緊砍斷心緒」，看那紙罩上的小青蟲，既覺可愛，又覺可憐。就寫成文字說，是八至九段。

末了一段，作者對燈噴煙，敬奠這些小英雄們；將所要表示的意見，較具體地表示出來。

(二) 重複法、排語、情感移入、象徵法。

本篇是用怎樣的手法寫成的？可分做幾點來說：第一是重複法。如「一枝是棗樹，還有一枝也是棗樹」（第一段）。「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沒有見過這樣的奇怪而高的天空」（第二段）。「我不知道那些野花草真叫什麼名字，人們叫他們什麼名字」（第三段）。「我即刻聽出這聲音就在我嘴裏，我也即刻被這笑聲所驅逐，回進自己的房。煤油燈的帶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第七段）。這些都是有意的重複。他的用意，在使人重讀，使人特別留心。否則，如第一例所舉：儘可以「二株棗樹」了之，又何必絮絮叨叨呢？徐霞村氏所譯西班牙作家 Ayala 的「一個農夫」，全文長僅七百餘字，竟用了四十個「他」字，與十二個「這位可憐的人」。其中有許多地方，代名詞原是可以省去的，但是他却用之不厭其繁，也就是爲了要使人重視的緣故。不過重複如果覺得累贅，那便是要不得了。例如巴金先生的植物園，有「皮色是灰色的」「一語，那「色」字的重複，却是不足爲訓的。這一點，初學的人應該注意才是。

第二是多用排語。如「她在冷的夜氣中，瑟縮地做夢，夢見春的到來，夢見秋的到來，夢見瘦的詩人……」「告訴她秋雖然來，冬雖然來……」（第三段），「他知道小粉紅花的夢，秋後還有春；他也知道落葉的夢，春後還是秋」。「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

空，使天空閃閃地鬼眈眼；直刺着天空中圓滿的月亮，使月亮窘得發白」（第四段）等等。「人對於某事某物有熱烈深切的感觸的時候，往往會一而再，再而三地申說。所以文字裏使用排語，足以表示熱情。這樣再三申說當然是嚴謹與平板的反面，所以又足以表示活潑。讀者讀了這種排語，自會引起一種感覺：彷彿一面經作者盡興指點，一面聽作者娓娓而談。」（見葉聖陶、朱自清合著的「精讀指導舉隅」。）

第三是「情感移入」，是將精神界的生命貫注到物質界中，使無生命的表示生命，無精神的表示精神，也就是所謂「增高的自然」。如第二段的「他的口角上現出微笑，似乎以爲大有深意，而將繁霜灑在我的圍裏的野花草上」。「他」是指天空而說的。天空並無大腦與嘴巴，怎能「現出微笑」？又怎能有什麼「深意」呢？「但作者情緒上感覺上好像他有，就把那種情意或動作歸給他。這樣的寫法，事物便蒙上了作者的情緒與感覺的色彩，寫事物也就是寫心情了。」（見「精讀指導舉隅」。）原來作者當時的感覺，天空是猙獰而陰險的；他（天空）把繁霜灑在野花草上，預料將使野花草遇凍而萎蕤，於是現出得意的微笑，而且自以爲意義深重的。這樣，他就用了「微笑」與「深意」二個詞。又如第五段說天空鬼眈眼，不安，想離去人間，避開棗樹；說月亮暗暗地躲到東邊去；說棗樹的幹子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都是這種寫法。

原來天空閃着星星，却說他是「鬼睜眼」；晚秋時節，天氣清朗，天空看去覺得高而且藍，卻說他是「不安」而想「避開棗樹」，棗漸深了，月亮也漸漸地走向東邊，這是天體運行必然的道理，却說他因為遇窘而暗暗地躲去；最長最直的幾枝落盡葉子的棗樹的幹子，梢頭似乎與天空相接，却說他「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都是作者當時的感覺，這感覺又從當時的寂寞、蕭瑟、苦悶到近於悲憤的情緒而來的。此外，在二三四幾段裏，這種寫法的例子還有不少，也不必一一舉出了。

第四是象徵法。象徵，是「借題於此，寄意在彼」，含有「改裝」的意味。「由於當時的北京政權仍然落在北洋軍閥手中，政局本身的混沌使魯迅充滿着哀愁的情緒。然而這種哀愁畢竟緩慢的開始變質了。第一是這哀愁漸漸加強了戰鬥的氣氛，露出向前衝的勇氣來了。第二是由於全國革命情緒高漲，魯迅的哀愁裏的悲涼孤傲之感，此時愈益加強了。為什麼全國革命情緒高漲，魯迅的哀愁裏反而加強了悲涼孤傲之感呢？這是因為一九二四年中國政治局面的變化，已明白顯出暴風雨將要到了，而在這暴風雨的前夜，魯迅還沒有找到戰友，他是孤獨的，雖然孤獨，希望却要求他迎着暴風雨出陣戰鬥。爲了他的孤獨，他是悲涼的；但爲了鼓起他的孤軍獨戰的勇氣，他就不能不用孤傲來藐視四方八面的敵人。所以魯迅的哀愁裏的悲涼孤傲之感，這時又特別加強。這是魯

迅要開始戰鬥，游勇上陣的另一方面的表現。」（見「魯迅的書」。）

明白了當時作者所處的環境和他的心境，也就不難臆測本篇「寄意」的所在了。作者藉着「秋夜」來象徵當時政局本身的混沌。藉着「奇怪而高」的「非常而藍」的「映着冷眼」的「現出微笑」的「夜的天空」，來象徵當時的北京政權的猙獰和顛覆。「而將繁霜灑圍裏的野花草上」，是象徵他們加之於小市民和學生的摧殘。瘦詩人的話則是作者的希望。棗樹的幹子，「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是象徵着「義薄雲天」的人，對於惡勢力死不妥協，反抗到底的偉大精神；也就是作者「鼓起他的孤軍獨戰的勇氣」，「用孤傲來藐視四方八面的敵人」，而「游勇上陣的另一方面的表現」。「夜遊的惡鳥的叫聲」，似乎是象徵當時的一些所謂「正人君子」們的驟突。遇火亂撞的小飛蟲，是象徵那些小戰士的熱情勇敢。幾乎全篇所寫的事物，都是象徵的。

（三）值得注意的地方

現在把本篇值得注意體會的地方逐一提出來說一說。（前面已經說過的，就不再說了）。第一段開頭，便點出了作者所站定的觀點，是「在我的後園」。作者在北京，原住甌塔胡同六十一號；一九二四年五月間，遷入西三條新購的房子。這裏的「後園」當

屬於後一處。第二語用了「可以」二字，似乎是「泛敘」的語氣，泛敘無論什麼時候，只要「在我的後園」，都「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但通讀全文，自第二段起，又全是「專敘」的語氣，專敘於某一天（九月十五日）晚上的所見所聞所感。這是因為牆外的兩株樹是固定不移的東西，隨時都能看見，所以用泛敘的筆法，在「看見」的上面，加了「可以」二字；而第二段以下所記述的，大體是一時所見的景象，所以得用專敘的筆法。

假如我們不知道作者寫作本篇的時日，單就字裏行間，加以體會，也可以知道所寫的是「晚秋」。如第二段說天空「奇怪而高」，「非常之藍」，便正是「晚秋」的景象。因為晚秋時節，天氣很清，天空看去自然覺得高而且藍，有時竟會高得奇怪，有時真是非常之藍。「我生平沒有見過這樣奇怪而高的天空」，以及接下去的「他彷彿要離開人間而去，使人們仰面不再見」等句，乃是極言天空的高，似乎還再高上去的樣子。又「閃閃地睜着幾十個星星的眼，冷眼」一語中的「睜」字就是較常見的「眨」字，意思是眼睛不住的開閉。這裏的一明一暗、閃動的星光是喻體；喻依是睜着的冷眼；而主旨則是陰險蕭條。又本段末句「而將繁霜灑在我的園裏的野花草上」，「灑」字是值得注意的。因為據我們所知道，霜是地面上的露水，遇冷凝結而成的，斷沒有從天空灑下

來的道理。這裏的所謂「灑」，是「似乎」灑下來的，不是「真的」灑下來。

第三段說小粉紅花更細小了，那是因為經不起繁霜的灑凍。但作者為什麼賦與她（小粉紅花）做夢？又為什麼要藉着瘦詩人的話來發抒他的希望呢？這是因為作者不滿於秋夜的蕭瑟，而希望春天的降臨；不滿於繁霜冷氣的凍萎了小花草，而希望小花草的欣欣向榮；更明白的說，是作者不滿於北京政權的摧殘無力的小民和學生，藉此寄託他的希望，希望新的日子早些到來！她（小粉紅花）為什麼會「一笑」呢？因為她夢見春的到來，夢見瘦詩人告訴她的話，頗覺自慰。——這自然又是「情感移入」的寫法。又本段裏的「慘慘」二字，是「續續」的通假字，讀如「琛琛」，應作赤紅色解。

第四段裏說「小粉紅花的夢，秋後還有春；落葉的夢，春後還有秋」。他（棗樹）為什麼能「知道」呢？這不消說又是「情感移入」的寫法。還有棗樹當初生滿了果實和葉子，因了地心的吸力，所以變成弧形；後來果實和葉子全部脫落了，所以又「欠伸得很舒服」。此外，四五兩段，寫最直最長的幾枝棗樹幹子，「默默地鐵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直刺着天空中圓滿的月亮」，使天空由鬼眈眈而不安，至於想避開棗樹；使月亮窘得發白，至於暗暗地躲到東邊去。這寫法和所象徵的意義，上面已經說過了。現在要補充說明的是：天空的不安，月亮的躲避，是象徵鬼蜮陰險的惡政權，遇到

了意氣磅礴的人，也會覺得羞慚和不自在起來了。作者也藉此來發洩他的「抑鬱」！

第六段先寫叫聲，後寫飛禽。這是因為先聽到了叫聲，然後才知道是「夜遊的惡鳥」，正照當時的實情。又「哇的一聲」如果改作「一聲哇的」，那讀者的注意力便在「一聲」而不在「哇的」了。正因為作者聽到了「哇的」一聲，覺得那聲音的險惡，情同幫兇，所以才由憤恨而發着冷笑（第七段，以下同）；又一則因為作者這笑是有意無意地發出的，再則因為作者當時正集中注意力於「哇的」一聲，所以一時竟不知道這笑聲是從自己的口裏發出來的。但因為是在夜半，萬籟都寂，所以雖是輕微的笑聲，也聽出牠的「回響」來，這回響，就是作者所說的「四圍的空氣都應和着笑」。待到發覺四周「沒有別的人」，於是即刻聽出這聲音就在自己的嘴裏，這樣的經過頗覺「凜然」，於是轉換了當初所站定的觀點，即刻「回進自己的房」。「煤油燈的帶子也即刻旋高」，是想避免凜然的空氣之再延續。

第八段裏有少數字句是值得討論的。如「後窗的玻璃上丁丁地響，還有許多小飛蟲亂撞」句，「還」字是可以省去的。因為有許多小飛蟲亂撞，後窗的玻璃上才丁丁地響；所以「後窗的玻璃上丁丁地響」和「有許多小飛蟲亂撞」，原只是一件事。若照原文於下一句加上「還」字，好像「後窗的玻璃上丁丁地響」是一件事，「有許多小飛蟲

亂撞」又是一件事。這是作者的疏忽。此外，如「牠於是遇到火，而且我以為這火是真的」；後一句粗看似覺多餘，因為既是「真的火」，何必再事置喙呢？但細看却覺得後一句也自有牠的作用在。如此重提，使讀者確信「這火是真的」。其意若說：這不是開玩笑的啊！所以像這樣的字句，是妥適的。

第九段寫作者想像「梔子開花時，棗樹又要做小粉紅花的夢」了。所謂小粉紅花的夢，是春夢，請回頭細看本篇第三段，便知其詳。又作者感覺小青蟲「可愛」，因為牠小巧美觀；「可憐」，因為牠小弱無力。

末一段寫作者用煙來致祭這些小英雄們，是對於這些小英雄們的勇敢表示敬意。這樣作結，意趣渾然，而且也將上文回顧了。

後記

魯迅先生的「野草」，所收的多是散文詩，多是用象徵的手法寫成的散文詩。那裏面有「秋夜」一文，雖然是寫景狀物的作品，但想像的分子特多，文字奇倔，實在不容易理解的。奇怪的是有好幾種的「初中國文讀本」，却都把它編入在第一冊裏。事實上，這篇文章，不但是十幾歲的初中一年級學生所不能讀得懂，就使是當教師的人，也多有

大傷腦筋而不得其解的。文中有些地方，全然是寫作者那時個人的心境，意思含蓄，就是那對於國文教學最有研究的夏丏尊、葉聖陶兩先生，在「文心」一書裏，也借着枚叔的口吻，說「我們除了說作者自己覺得如此以外，更別無什麼可解釋的了。」又說，「真能够懂的怕只有作者魯迅自己了。但是魯迅雖能真懂，却也無法解釋給你們聽哩！」我雖不敢說能真懂「秋夜」，但說他「畧懂」，大概也就沒有什麼語病了。現在依照葉聖陶、朱自清兩先生「精讀指導舉隅」的方法，寫下了這篇文章；文中關於「象徵法」的一段，完全是憑自己的臆測，如果有錯誤的地方，還希望葉聖陶先生或讀過這篇文章的國文教師們加以指正；同時更希望「學叢」的同學們就本文範圍內提出討論的意見，或可藉此引起研究魯迅先生作品的興趣。

一九四九年一月卅一日稿，發表「學生文叢」。

一三 讀簡又文「太平天國田政考」

近承簡又文先生送給我一冊他的近著「太平天國田政考」，是香港大學「東方文化」半年刊第一卷第一期的抽印本，一九五四年一月出版的。文長四萬餘言，分上下二篇。上篇爲「理想的田制」，作者先將太平天國關於新田制的原文錄出，然後根據新田制的原文，作十五點的批判研究，於是結論說：

「太平天國的新田制，出發由宗教信仰，動機在救民養民，原則基於公平，男女待遇平等，有中西文化之折衷，有推陳出新之創製，於大體上言，本未可厚非。惟是政策太不完善，辦法過於草率，在這個人口衆多、生活複雜、文化優越的社會中，尤其在當時戰事不息的時期中，斷難付諸實行的。」試觀其後十餘年間，在各省佔領區內所實施的田政，凡『天朝田畝制度』所定的田制，均未實施，則可證明此均田制度僅爲紙上空談之計劃也。」

作者更引據近年來海內研究太平天國史的學者如蕭一山、羅爾綱、謝興堯、范文瀾諸家之說，以資參證。各家皆持此結論，故可稱爲定論。

接着，作者更推論太平天國雖製定及頒佈新田制而却不能實施之由，有如下六端：

- 一、由於天下之未寧也；
- 二、由於戶籍之未編定也；
- 三、由於行政官吏之缺乏也；
- 四、由於沒收私產恐激民變也；
- 五、由於新田制之不利於政府也；
- 六、由於新制本身之不完善難於實行也。

下篇爲「實施的田政」。「吾人既確知天朝之新田制全部未嘗施行矣，但其於十餘年間在佔領區內所實行的田政爲何如？」國人注意此問題已久，而總不能得到滿意的答案，蓋一般研究太平天國史者每苦於史料及憑據之缺乏，無由着手。若只憑片面紀錄或一二公文，便下論斷，未免陷於籠統抽象的弊病，所謂「孤證不立」。作者於廿年來從各處得見天朝田政之文據多種，曾陸續發表於「逸經」「大風」等半月刊，復得友人葉恭綽、龐漢三、董健吾諸君之助，蒐藏公文文據及珍貴罕見之史料至夥。最近，國內又印行太平天國史料（包括文據）多種，皆有助於本問題的研究。於是，作者簡又文先生綜合一切的史料，進行澈底的科學的研究，以期對此重大問題求得詳確的答案，所引書刊多至二十餘種，所引文據多至五十餘類，斷定天朝治下十數年間所施行的田政實況，其政策係以「照舊」爲大原則。并以七種公告及文件爲其改訂新政策之證。而其表示實行「照舊」之田政尤爲明顯者，厥爲浙江嘉興府桐鄉民務官符天福、鍾良相於辛酉十一

年七月十三日所出之安集四民告示，其第九條云：「被難之後，房屋貨物田產，准歸原主議認收回，侵佔者立究。」又第十條云：「住租房，種租田者，雖其產主他徙，總有歸來之日；該租戶仍將該還錢米繳還原主，不得抗欠。」作者以爲「由此益可明見天朝不特并未實行土地國有，私田充公，重新均分之田制，而且承認私有田地，甚至一般流亡在外的田主一旦歸鄉仍得收回舊業，收回舊租，則此新政策之切實保護私產，可謂至矣。」

然而天朝田政所謂「照舊」政策之實施的程序，又爲如何？作者根據各種史料，作詳盡與透徹的研究，用分析與綜合的方法，而得以下十一條具體的答案：一、私人田地所有權一概照舊；二、田地類別大致照舊；三、各種戶名照舊；四、私人所有的田地額均照舊；五、田戶清冊大致照舊；六、新造田冊田戶照舊；七、辦理田政吏員盡量照舊；八、徵收田賦之方法大致照舊；九、天朝田政之稅則照舊不劃一；十、在天朝實施的田政之下，究竟各地一般勞力耕種的農民，其負擔如何？因真相未明，實額未得，仍無從作概括的斷論；十一、清制縣官收糧，除去額定留縣者外，其餘解入藩庫，并報告實數，一一有規定的法制。天朝無此政制，由各郡各縣各自爲政。其徵收糧銀多少，既無定額，亦無實數。地方所收者，各局留下費用之外，乃解交縣郡政府。以後再解與省

級機關與否，不可知矣。

臨末，作者細考其徵收之方法與手續，斷定天朝田政是不完善的政治；政府、社會、人民俱不得其益。以爲這是初時無政治人才爲之立善法、創善舉之故。及其後期，雖有才識淵博之于王洪仁玕主持國政，無如是時天朝已漸入衰亡期，朝綱紊亂，腐化日深，內則軍人跋扈，事事掣肘，外則積習已深，狂瀾莫挽，終無以改革田政矣。

簡先生係我國最特出的太平天國史家，幾乎一提到「簡又文」，就使人想到「太平天國」，其造詣之深，至足驚人！「太平天國田政考」之作，非熟諳古代田制，深究太平天國史而又有豐富之經濟學識者莫辦。尤其是下篇，作者僅據各方面之零篇斷簡，推斷天朝所改訂之田政，多仍清制，給予學術界的貢獻更大。我於太平天國史是門外漢，只能畧事介紹而已。

——一九五五年二月九日「星洲日報」史地周刊。

一四 「柳如是」

這是去年的事，因了友人俞友清編輯「紅豆集」的徵稿，於是，我便急急忙忙去搜集參考的資料，多讀了不少的舊書。其中有一本是「牧齋遺事」，殘稿僅八葉，從牧翁殿試後起，都是敘述他和妾柳如是的逸事：自交讖至結合，自結合而至牧齋病死，柳「殉節」。這篇文章並未署明撰者的姓名，不知出自何人手筆。

秋天，我作客榴山，在流傳圖書館看到的一部「香豔叢書」（商務版），在二集卷二中也有一篇「牧齋遺事」，但題目却改作「絳雲樓俊遇」，並加上了標點；而且在正文的前面，加了一葉的「牧齋小史」，末葉也加上了幾句崑崙子的「附識」，題於庚戌正月上浣一日，云：

「予友震澤徐奎伯孝廉有『詠河東君詩』云：『一死何關青史事？九泉羞殺老尚書！』蒙更有知，難乎其爲夫婦矣。」

此之所謂「絳雲樓俊遇」。

還記得幾年前，有一位錢牧齋的同鄉——虞山人曾樸，在他自己主辦的「真美善」

雜誌發表了一篇「柳如是」，（按其後世界書局朱劍芒君編的「高中國文」第一冊，曾把它選入。）全文大意與「牧齋遺事」並無不一樣，不過把文言文的原文改譯作較白的白話文，間或畧爲增刪幾句而已。如原文中在記述俞嘉言醫生治愈錢的倒仆之驚的病之後，還有兩頁有奇是敘述該醫生過去治病靈驗的事跡，這顯然與主題無甚關係，故被刪去。插入的也得舉個例：如曾君在改譯：

「……客有挾著述願登龍門者，雜沓而至，幾無虛日。錢或倦見客，柳卽出與酬應：或貂冠錦襪，或羽衣霞披，雄辯泉流，清談風起，座客爲之顛倒！客當答拜者，則肩鎬輿，隨女僕，代主人過訪於逆旅，卽事拈題，共相唱和，竟日盤桓，牧翁殊不芥。」這一段之後，就插着說：

「這種風氣，絕類法國『沙龍』，想不到吾虞在明季就已實行了，真是一件值得誇耀的事！」

末後還有一段，也應是曾君自己的：

「伊的詩集名『戊寅集』，未見傳本。伊的詩僅散見牧齋初、有學集數十首，及各家詩話中，皆纏綿悱惻，風致逸宕之作。我在北京看過王西樵士祿編的『然脂集』，選錄較多，并有散文。『然脂集』後歸江劍霞，現在不知傳入誰手了。又我友黃謙齋藏有

毛雲飛小汲古閣抄本的柳河東「紅豆山莊雜錄」兩冊。」

敘事的文章，固然可以借光他處；但像「柳如是」那麼樣，老實說，却只好當作「改譚」看，并不能算是自己「撰」的。曾君假如未死，不知以爲何如？



中國文學概要.....曹聚仁 H.K \$3.00

中國幾千年來的文化，在歷史上有着輝煌的光彩，是世界上一朵燦爛之花。我們學習中國文學，必須首先獲得一個片面的認識，進可作深入之研究，退可供普通的應用，於處世立身，修學治事，皆有極大的裨益。

「中國文學概要」一書，是以研究中國語文及中國文學為中心，內容緊密，對於歷年來中國各方面學者之研究成果，詳盡介紹，是一本良好的文學書籍。

中國語法講座.....吳靈子 H.K.\$2.50
文言文的讀寫方法.....任幼羣・區建芝 H.K.\$1.70
寫作方法講話.....任幼羣 H.K.\$1.80

這裡指出寫作方面的種種困難，提出種種適當的解決辦法，對於一般的青年學生，可說是最簡捷的寫作橋樑，同時，也是中學語文科最有效的補充讀物。無論堂上講解，課外自修，都可以引發無限的興味，對一般寫作。極有幫助。

國學的基礎知識.....馮明之 H.K \$2.00

◀ 總 經 售 ▶

星·吉·檳	世界書局
香 港	世界出版社
椰 城	大成書局
泗 水	中國書局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定價港幣一元二角